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上海市台商的流動能力與身份選擇



指導教授：湯京平 博士

研究生：蔡馥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

感謝中華發展基金獎助研究

謝 辭

我終於動筆了人生第一篇的謝辭。記得以往翻閱許多書籍與查找相關論文著作時，我總喜歡欣賞作者於書卷開頭的自序和謝辭中敘說的種種感謝、寫作的靈感來源、思想歷程，或者是能讓人會心一笑的寫作軼事。每次，我也會想到若也有寫謝辭或自序的機會，我會怎麼樣去感謝在這段寫作過程中所受到的諸多幫助，這些浮現在我回憶中一張張親切充滿溫暖的面孔。

最感謝指導教授湯京平老師耗費時間，大力幫忙我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研究方法與文章撰寫的諸多指點，讓本論文能順利通過。

感謝耿曙老師帶領我進入台商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和對我的許多肯定和讚美，並且引導我發現本論文的研究主題。

感謝口試委員：王振寰老師與鄧建邦老師對本論文的指正和建議。

感謝魏玫娟老師傾聽我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和給出寶貴的人生經驗與建議。

感謝台北大學的王信賢老師在大學時代為我奠定的政治學基礎，讓我得以順利地從法律系轉到政治學領域。感謝郝培芝老師給我在準備轉換領域過程中的許多肯定。

感謝國發所的馬姐幫忙我申請田調後的經費報支，感謝助教佩琦學姐在論文流程與打工等事物的提點，和政大研究發展處陳瑞英小姐協助我準備申請田調補助的種種申請文件。

感謝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對本論文的全額經費補助。

在繁忙充實的田調過程中，最感謝帶領我進入田野的東亞所意植學姐對第一次進行田調的我的許多提點、包容和體貼，跟學姐一起田調的這段時間，我學習到許多人際交涉和深度訪談的技巧，更感恩學姐帶領我結識這些熱情、親切的台商們，他們所提供的訪談資訊豐富了本論文的研究內容。

感謝許多學長、姐對我在寫作過程的建議、解惑與打氣：一齊前往上海的東亞所瑞華學姊、為元學長、奕伶學姊在上海行對我的照顧和論文寫作的討論，家煌學長的鼓勵跟打氣；政治所的世傑學長、易宏學長給我寫作上的建議。

同學們在寫作過程中的彼此打氣是精神上的好戰友：感謝一起赴上海田調的姿秀、以衡與志文，彼此互相照應和協助。感謝外交所的佳蓉對我的許多貼心關懷。感謝國發所的懿紘、思盈、哲逸在每次聚餐時的打氣，願意傾聽我吐吐寫作上的苦水；感謝同學們的關懷，佳樺、宛真、秀濱、家科、濟安、奎佑的友情支持。

感謝蔡爸爸跟蔡媽媽在精神與物質上大力支持我念書，讓我無後顧之憂地撰寫論文，感謝大弟宗軒跟小弟宗騁的加油和打氣。更感恩在今年三月逝世的奶奶，您投注許多心力照顧我們，是這麼以我們三個孫子女為榮，祝您老人家在天之靈能幸福、了無牽掛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感謝桃花源家人的精神支持和打氣：舒涵老師的溫柔關懷，秀娟、玉菁、朱朱、親親、威心、佑葳、河馬、仲子、孟湧、孝恆和陳鵬，不時為常陷入焦慮情緒的我給出溫暖的關心。

感謝男友光磊的一路相伴，體貼與包容我在遇到寫作瓶頸的不安、焦慮，熱心跟我一起討論，提供了許多寫作上的靈感。能夠與你相逢，讓我生命更加豐盛。

最後，以某個失眠夜中靈光一閃的古詩改編，作為這段與論文奮鬥時光的註腳。

「日不知寢食，
夜也難安枕。
憶韶光之匆匆，
書謝辭而涕淚。」

蔡馥宇，七月仲夏雷鳴時，於政大

摘 要

全球化的移民浪潮湧現，各國紛紛透過放鬆移民限制吸引白領移民前往投資和長期居住，展開對擁有資金和技術的白領移民之跨國爭奪，而活躍於全球市場的台商即為其中之一。另外在台商研究之中，從經濟面向研究者眾多，但台商的跨國生活與社會形態目前仍較少有學者關注，而對於台商為經營跨國生活的身份選擇考量，相關研究仍屬有限。有鑒於此，作者乃以上海市台商為研究案例，從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所提出的核心分析概念「跨國社會場域」出發，整理傳統移民研究中的人員遷移因素，歸納出四種流動能力的要素，並結合公民身份理論，說明台商的流動能力如何影響其在移居國的身份選擇考量。具體而言，根據作者初步調查發現，由個人能力、跨國網絡、全球觀所構成的流動能力，在穿越國家所設下的跨界障礙後，能夠持續形成跨國社會場域，而台商為了要能夠維持其所賴以為生的跨國社會場域，來加以考量是否要選擇中國大陸的成員身份或者是公民身份。如果台商的個人能力較弱、跨國網絡缺乏、經濟發展為主的全球觀，較傾向於會考慮選擇中國大陸的成員身份或者是公民身份來強化既有的跨國社會場域經營；反之則否。

關鍵字：跨國移民、台商研究、流動能力、公民身份、身份選擇、跨國社會場域

目 錄

第一章 全球化移民浪潮衝擊國族身份秩序.....	1
第一節 世界各國的白領移民爭奪戰.....	1
第二節 白領移民的身份選擇邏輯.....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良禽擇枝而棲？跨國移民對公民身份理論之挑戰.....	9
第一節 跨國主義移民研究對國族的質疑.....	9
第二節 移民現象對公民身份理論的修正.....	10
第三節 人員流動因素.....	18
第四節 研究架構.....	23
第三章 上海市台商的身份選擇考量與流動現況.....	27
第一節 上海市台商身份選擇的不同考量.....	28
第二節 上海市台商的流動現況.....	36
第三節 小結.....	46
第四章 大鵬逍遙遊？受訪案例的流動能力之分析.....	47
第一節 個人能力是能否穿透跨界障礙的因素.....	47
第二節 跨國網絡的形成與持續性.....	50
第三節 變動中的全球觀.....	55
第四節 小結.....	63
第五章 結論：旅人世代的產生及困境.....	6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6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71
第三節 未來的研究方向.....	72
參考文獻.....	75
附錄一 訪談名單.....	81
附錄二 跨國社群成員訪談提綱.....	83

圖 次

圖一	公民身份政策的三階段圖示	12
圖二	全球資本對公民身份的轉變過程	18
圖三	本研究分析架構	24
圖四	跨界流動後財富增加示意	38
圖五	成員身份的跨界變動	41
圖六	白領移民的跨國場域	42
圖七	台商社群的跨國社會場域	43
圖八	情境一 $M1=M2$	44
圖九	情境二	44
圖十	情境三	45
圖十一	全球觀的變遷路徑	64
圖十二	流動能力所形成的跨國社會場域	68
圖十三	流動能力、身份選擇、跨國社會場域的交互影響	70

表 次

表一 上海市的簡介.....	6
表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之特徵.....	8



第一章 全球化移民浪潮衝擊國族身份秩序

第一節 世界各國的白領移民爭奪戰

從二十世紀晚期開始的全球化，產生諸多議題深刻改變全球樣貌，其中與本論文研究問題切身相關的有三個部分。首先，在二十世紀掀起的交通與資訊革命，時間縮短，距離拉近，轉變成千里一線串起的地球村。貨品、技術、資本在被「推平」的世界中暢行無阻，形成全球範圍的市場（楊振富、潘勛譯，2005）。而在其中的企業爲了面對越界而來的競爭與機會，紛紛建立起「全球生產網絡」，走向「全球佈局」（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Cohen, 1997; Moses, 2006），同時帶動了比上個世紀更爲頻繁的人員跨國流動現象，使離鄉背井、暫居異地「跨國社群」之存在成爲常態（Gupta, 2004）。

隨著跨界的接觸愈加頻繁，以鋪天蓋地之姿席捲世界各地的全球文化面對本國文化的抗拒，這讓「認同」成爲「全球時代」最爲突顯和引起衝突的議題，「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成爲全球化、後現代、後物質年代中，最顯眼的政治議題（石之瑜，1995；夏鑄九、黃麗玲等譯，2002）。而身在其中，體驗最深，拉扯最劇烈的就是在跨國移動的「跨國社群」：一方面緬懷故鄉，卻面對漂泊離散，另一方面身處異國，卻難免被排斥質疑。跨國社群所遭受的文化衝擊和融合問題，成爲全球化浪潮下，最被關注的研究焦點之一（Ong & Nonini eds., 1997; Ong, 1999）。全球化現象所帶動的大量人員遷移流動、認同與身份定位的問題，亦成爲當今許多國家面臨處理移民的重要課題。在2009年10月發布的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更以《超越障礙：人員流動與發展》（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爲題，探討當今全球的移民狀況、影響與改善對策，¹ 顯示出移民的課題相當受到國際的重視。

而全球時代中的「地方」角色凸顯，成爲替代國家參與全球活動的角色(Taylor, 1993; Saxenian, 1999)。在此過程中又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角色最突顯。全球範圍的資源流動，帶動資源組合的拆解與重組，重新聚集在「全球地理」的中心——「全球城市」(Sassen, 2001; Taylor, 2004)。城市吸引、容納「跨國社群」，即成爲全球時代的象徵，因爲全球流動、全球競爭、多元景觀等現象，如今都在城市內展現。而城市又無法自外於國家的疆界，全球城市是國家與全球的重要接點，從全球城市的研究中能夠掌握國家在面對全球時代的變化百態。

由上述三大議題可知，全球範圍的市場的形成，帶動了人員的跨國流動以及全球城市的興起，使得跨國而來的經濟競爭更加劇烈。在此同時，爲了掌握更多能影響生產的資金與技術，此一經濟競爭轉變爲各方——國家間、產業間、區域間、城市間、企業間——對「人才」或「高端人力」(talents/human resources)(Sullivan, 2005)的競逐。²

跨國而來的人才，一則可因應產業所需、填補國內不足；二則爲提昇視野，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極度缺乏的全球視野，如全球佈局的眼光、國際競爭的壓力等。投資流向雖然由獲利決定，獲利潛能卻由「人才」判定(鄒應瑗譯，2003：75)，因此跨國資金的流動，總是緊追著跨國人才的步伐(Roose ed., 1998; Stewart, 2001; Krogh eds., 2005)。所以，人才的「跨國流動」成爲近年跨國網絡之間密切互動所形成的「技術社群」(technical communities)，這也是如矽谷、竹科之類的

¹ 2009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請查閱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9/>。查閱時間：2009年10月5日。

² 本論文所指的「人才」或「高端人力」，是有創造高附加價值能力的人，乃指具有專業技術的科技人士，同時也包括所有跨國流動的企業經營、製造、服務人才。

高科技園區核心競爭力所在 (Saxenian, 1999; Saxenian & Hsu, 2001; Saxenian, 2006)。因而世界各國或者區域皆需要借重白領移民的資金與技術促進其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

關於資本家、高端人力、專業人才、技術移民跨國流動之研究，都是屬於移民研究的範疇。不同於從事低技術和勞動的藍領移民，他們被歸類為白領移民。藍領移民是傳統移民理論的研究焦點，這些移民大多屬於弱勢的社會底層 (underclass)，多為生計所迫要往發達的地區尋求工作和生存機會，而由落後的地區往發達的地區移動，由此發展出的移民理論，如推拉模型、移民經濟、雙層勞動市場 (dual labor market) 等角度出發，解釋藍領移民的流動 (Portes & J. Böröcz, 1989; Stalker, 1994; Sassen, 1995; Granovette, 1995; Portes, 1995; Taylor, 1999; Heisler, 2000; Papastergiadis, 2000; Stalker, 2000)。

白領移民的身份往往屬於能全球自由流動的專業人士。有學者注意到，伴隨著全球化的跨國公司而來的是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出現，這群白領移民由跨國企業的主管成員、全球化國家的官僚主義者、政客、專業技術人員和在商品、媒體方面的消費主義菁英所構成 (劉欣、朱曉東譯，2002)。這些成員控制著大部分的世界經濟，成為溝通本土與全球的橋樑和中介。他們的興趣在全球，而不是地方或國家。他們屬於跨國移民群體中的一小部份，卻掌握了絕大的影響力 (閻紀宇譯，2008)。雖然不同學者嘗試利用一些形成中的概念——如「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跨國社群」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以及「去領域性」 (de-territorialization) 等——建議初步的理論模型和分析架構，但仍然缺乏較具系統性的理論 (Basch, Schiller & Blanc, 1994; Khagram & Levitt eds., 2008; Papastergiadis, 2000)。

爲了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國家或區域所採取的吸引白領移民到來投資

或奉獻技術的移民政策是重要的觀察重點。移民研究有跨學科之性質，但長久以來，對於所謂「移民理論」的建構是屬於經濟、人口、及社會學者的研究範圍，較少學者從政治層面研究移民現象（盧倩儀，2006）。移民政策是決定移民模式的重要因素，也主要決定了全球移民的範圍（Meyers, 2004: 3）。由於當前世界各國的白領移民政策絕大部分都以提供快速取得居留權、永久居留權，甚至是該國的公民身份為主要的誘因，希冀能達到「引才又留才」的效果。公民身份政策成為白領移民政策的核心要素，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白領移民的流動方向與選擇移入國的考量。

如同汪宏倫（2009：75）特別用「國際檔案分類系統」形容「民族國家的制度成為整個世界的運作模式，與人們認知現實的基礎」。當全球社會的運作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的組成單位，至少要擁有一組國籍與公民身份成為一種生活在地球村的必要標籤，成為無國籍之人就等於是成為在國際社會中頓失依靠的孤兒。但是在跨國人員流動如此頻繁下，國家以公民身份政策作為招攬白領移民的政策手段，是否意味著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的國族象徵愈加鬆動？尤其對於跨國社群而言，如何在雙重或多重的生活空間，選擇適當的公民身份，不僅僅是生活的便利性考量，也關係到如何認同或效忠哪一個國家的抉擇。

第二節 白領移民的身份選擇邏輯

有別於一般的移民文獻所述，移民在移居國會因不具有公民身份而無法享受到某些社會福利、工作權的保障，讓他們在移民國的生活相當不便，也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移民都會希望能爭取到相關的權利，以保障他們在移居國的生活。但從本研究在上海所觀察到的台商皆沒有出現此行為。³ 這也與以往的公民身份

3 2009 年的夏天，作者隨著研究團隊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的田野，發現不同於一般移民文獻所

理論所認為的公民身份對移民的重要性，出現理論與經驗的落差。誠如 Bauman（張君玫譯，2001）所言，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種新的全球階層化，「移動自由」的有無造就了「流動」與「固著」兩種階級。對此種新的全球階層化現象而言，公民身份就有所相應的不同意義。

為何在上海市的台商不會去爭取公民身份？怎麼選擇身份的考量可能是認同、生活的方便性或者只是單純的隨遇而安等多重原因，而本研究所觀察到流動能力的保持，可能是主要的原因。這也是本研究接下來所要處理的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及半結構式問卷為主，並且以上海市為田野調查的場域，執行研究的流程以及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研究限制皆在本小節後段詳細說明之。

一、 研究地點與資料蒐集

（一） 為何選擇上海市？

考慮到田野場域的便利性、訪談對象的可得性，以及能夠代表全球城市此一新興全球化現象，足以呈現資金與人才競爭，跨國社群匯聚的樣貌，本研究選擇

載，移民會向移居國爭取跟公民身份有關的權利。本研究所走訪的上海市台商社群，反而不覺得十分必要去爭取當地權益，縱使他們常常提及中國大陸的醫療水平太差，醫療服務態度很差，擔心子女在大陸受教育會不會被同化，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讓他們的經營成本增加許多等種種困擾。而本研究所訪談到的台商有不少是想要在中國大陸長期經營，他們的孩子許多也就讀當地的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各個階段都有，其中不少的父母鼓勵或至少不反對孩子之後在中國大陸就業發展。不過每年他們都會撥出時間回到台灣，探望在台父母、親戚、朋友，或者是辦辦公事、使用健保醫療。他們的表現就是相當典型的跨國社群，可是他們並沒有出現傳統移民文獻所述的，將拿到當地社會的公民身份或者是移民的權利看成重要的大事，也沒有出現集體行動去向移居地政府爭取居住當地的權益。

了上海市做為田野場域。上海市為中國大陸一級的直轄市，相較於政治中心的北京市而言，上海市被稱為是中國大陸的經濟首都，也同時被評價為世界級城市。

⁴ 上海市也是重點發展城市，目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工商時報》，2009/03/26：A8 版）、航運服務中心（《中國時報》，2009/04/06：A9 版）。在產業結構部分，雖以工商業、金融等服務業為主，也設立了張江科學園區。上海市內聚居許多分區居住外國社群，台籍社群主要是集中在虹橋，西方人士、日、韓籍社群是集中在古北區（李麗，2006），相當有幫助於個案的尋找和深度訪談的進行（請參下表一）。

表一 上海市簡介

	城市治理 體制	城市的重要性	產業結構	跨國社群聚集
上海市	直轄市	◎ GaWC 評價：1 級世界都市+（Alpha+） ◎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指標城市，也是重點發展城市，目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服務中心	以工、商業、金融等服務業為主，有張江科學園區	虹橋：台籍社群 古北：日、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訪談抽樣與資料特徵

本文主要以深度訪談及半結構式問卷（請參照附錄二）為主。由於本研究的
研究問題為「台商的流動能力是否影響其身份選擇」，而這個問題的考量是相當
個人主觀的、特殊的心理狀態，也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並且會隨著時空背景的

⁴ 在 GaWC 的世界級城市名冊 2008 年版的排名中，上海被列為第 1 級世界都市+（Alpha+）。全文網址為：<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08t.html>。GaWC 全名為「全球化與世界級城市研究小組與網絡」(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於 1999 年起，以英國英格蘭萊斯特郡拉夫堡的拉夫堡大學為基地，嘗試為世界級城市定義和分類。世界級城市名冊是以國際企業的「高階生產者服務業」供應，如會計、廣告、金融和法律為城市排名。GaWC 的名冊確認了世界級城市的 3 個級別及數個副排名。

變遷而有所不同，會呈現其複雜性。因而本研究是以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結合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並以「關鍵報導人訪談」(key informants interviewing)之方式，此方式是指與具有專門知識、地位或溝通技巧的個人，作深入的訪談，他們願意和研究者共同分享知識與技巧 (Spradley, 1979)。

在深度訪談的個案選擇方面，選擇台商的跨國社群成員為主，一方面前往上海市投資經營的台商符合本文中所指涉的白領移民的定義，另一方面台商在上海市已經形成一股人數眾多且具代表性的外來移民群體，也是本研究容易從中尋找訪談個案的白領移民群體。本研究同時採用滾雪球的方式，透過熟悉上海市的台商社群之相關人士介紹受訪對象。⁵

本研究所分析的訪談資料是為 2009 年 7 月 7 日~2009 年 8 月 25 日迄，在上海市所訪談的 39 位受訪者，其中男性有 24 位，女性有 15 位，女性比例接近四成。所從事的產業有 23 位是製造業，比例為 58.9% 為最高，服務業為 4 位，8 位是從事其他產業，4 位是仍在就讀的學生和待業中的台人。若以職業來看，其中以親手經營自有企業的中小企業主 (也就是狹義的台商) 為最多數，共 17 人，⁶ 比例為 43.6%，其次是受雇的經理階級總共 15 人，專業階級為 3 人，無職業的有 4 人。本研究的受訪者只有 2 位擁有中華民國以外的國籍，其餘 37 位都是持中華民國護照，全部的受訪者都是拿台胞證進出中國大陸。而移居大陸的時期⁷ 主要是集中在 1990 年代初到 2000 年初的第三波登陸潮，有 28 位，比例為 71.8%，其中受訪的台商配偶、子女皆在這個時期前來，占了 10 位。另外在 1980 年代末開始的第一波即西進的有 6 位，在 1990 年代初的第二波前來的有 5 位(詳

⁵ 既然台商社群是本文的研究對象，本研究先說明所採用的台商定義以及訪談資料 (訪談名單請參附錄一)。本研究的「台商」是採廣義的定義「以獲利經營為目的而持續旅居國外的台灣人」，同時包括了「老闆級的台商」(狹義的台商) 跟「幹部級的台商」，並且每年居住於移居國三個月以上 (耿曙，2008：5)。

⁶ 本研究在此項的人數統計也包括共同經營企業的台商配偶。

⁷ 本研究所分類的登陸時期，第一波為台商西進之初，約在 1980 年代末與 1990 年代初；第二波為台商投資逐漸壯大的階段，約在 1990 年代初期以後；第三波是在 1990 年代末，尤以 2000 年台灣總統大選以及 2002 中國大陸加入 WTO 之後。(耿曙，2008：10-11)

細的說明請參表二)。

表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之特徵

項目	類別	次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24	61.5
	女性		15	38.5
產業別	製造業		23	58.9
	服務業		4	10.3
	其他		8	20.5
	無業/待業		4	10.3
職業別	企業階級		17*	43.6
	經理階級	高階台幹	9	23.1
		中階台幹	6	15.4
	專業階級		3	7.6
	學生/無業		4	10.3
國籍	單一		37	94.9
	雙/多重		2	5.1
登陸時期	第一波		6	15.4
	第二波		5	12.8
	第三波		28**	71.8
(N=39)				100.0

* 本研究訪談對象中共有 4 位台商配偶，雖然她們都沒有職位，但都是擔任公司財管的角色參與公司經營，因此本研究也將 4 位台商配偶列為企業階級。

**第三波的人數增高，是因為本研究受訪的 4 位台商配偶、6 位台商子女，都在此時期登陸。

二、 研究流程與限制

雖然用滾雪球的方式，導致選樣偏差，但基於下列原因，應不至於影響研究效度：首先，本研究專注於較少數的個案，是因為本研究想要更深入發掘在正式制度面的移民政策之外的隱性規則，所以所挑選的訪談對象是必須能全盤瞭解整個白領移民社群狀況，才能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所幫助，而符合此種條件的訪談對象本就少數。其次，所能利用選樣的關係雖有限，但與研究的主要變數無直接的關連，如果選樣有失誤，不會直接削弱所得結論。

第二章 良禽擇枝而棲？跨國移民對公民身份理論之挑戰

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是白領移民的流動能力是否影響到其身份選擇的類型，因而本章檢視與此問題相關的理論。首先從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開始，跨國移民在其跨國社會場域所表現出的對母國與移入國的雙重政治參與以及雙重效忠，對於傳統的公民身份理論造成挑戰。再者，本研究將回顧公民身份的相關理論，以及其如何回應移民所造成的衝擊。其次，本研究從過往的移民理論以及台商研究中檢視目前尚未受到深入討論的移民的流動能力因素，並且初步歸納出四種構成流動能力的因素作為本章最後一節的研究架構的分析概念。

第一節 跨國主義移民研究對國族的質疑

建立於二十世紀九零年代的跨國主義理論，是由三位美國人類學學者 Linda Basch、Nina Glick Schiller、Christina Blanc 將原本在經濟學、社會科學、文化研究被廣泛使用的跨國概念引入移民學領域，以拉丁裔移民的經驗研究為基礎，較為系統的提出跨國主義的概念、理論和分析框架。它做為移民研究的新方法，在歐美學界得到廣泛重視。

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指的是：「移民形成與維繫的多重的連結原籍地與定居地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進程」。它強調當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s）。跨國主義也因此成為「將民族國家疆界以外的人民與機構連接起來的多重關係和互動」（Basch, Schiller & Blanc, 1994; Khagram & Levitt eds., 2008; 吳前進，2007）。

跨國主義觀點認為最好以「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來理解當代的移民。這群跨國移民的日常生活是依賴於跨越國界的多重性和經常性的相互聯繫，其公

民身份是在一個以上的國家構建的 (Basch, Schiller & Blanc, 1994: 7)。她們引入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提出「跨國社會場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概念，使其成為分析移民跨國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這種跨國場域是由不斷增長的、過著雙重生活的人組成：她們說著兩種語言，同時在兩個國家建立家園，通過經常性的跨國聯繫而謀生 (Basch et al., 1994: 27-30)。

跨國主義理論主張人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公民模式：公眾需要的是作為人的權利，而不是作為民族一員的權利 (Ong, 1999 ; Itzigsohn, 2000 ; Tan, ed., 2005)，它要求承認民族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因此，從跨國主義角度研究移民的政治選擇問題，通常集中在移民在移出國和接受國之間的身份認同經歷。跨國網絡將母國與移入國聯繫起來，推動人們對這兩個空間的參與，這就對政治共同體要求其成員單一效忠提出了挑戰，從而導致對共同體結構和國家之間的平衡重新加以界定的要求。多重成員身份與多重效忠使得公民身份 (citizenship) 的概念受到質疑。一個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只屬於單一民族國家的原則不再適用。

但是跨國主義觀點的移民研究對其所提出的跨國社會場域的概念仍缺乏更深入的理論定義，也無法對全球化中快速流動的白領移民行動邏輯做出更具系統性的解釋，這也是本研究嘗試要去著手討論之處。

第二節 移民現象對公民身份理論的修正

因為移民是否能流動，往往是決定於移民的移入國願不願意開放疆界讓移民進入，這同時涉及到接收國對於願意接收的移民類型的偏好選擇、接收移民的配額、移民在接收國可以享有和負擔的權利義務。雖然不管有沒有開放疆界，都可能會有非法移民的問題，但只要移入國開放疆界，就可能提高他國人民移民該國

的意願，甚至帶動起移民的浪潮。上述移入國對於移民的管制政策，就是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分兩大部分，一為移民控制／管制政策，二為移民的居住政策。移民控制政策關注永久性移民、短期移工和難民的允許和選擇，和對非法移民的限制，這也是狹義所談的移民政策（Meyers, 2000）。Meyers 從移民政策的制定過程，來評估不同的理論對於國家決定接受多少移民、何時接受、接受類型和族群來源的解釋能力，他提出六種移民政策理論途徑，分別是「馬克思主義途徑」（Marxism）、「國族認同途徑」（the “national identity” approach）、「國內政治途徑」（the domestic politics approach）、「制度途徑」（institutionalism）、「現實主義途徑」（realism）、「自由主義途徑」（liberalism）。⁸

Meyers 也觀察到近年來各國移民政策趨同的情況，這是源於世界各國追求經濟發展模式的趨同，導致許多國家都希望爭取技術人才和投資移民（Meyers, 2002）。而 Meyers（2004: 10）歸納其分析五個歐美國家的移民政策的結果，提出一國的社經因素、對外政策與所接受的移民類型三者間的互動決定了移民政策，但其所分析的案例皆為歐美國家，缺少對亞洲國家的移民政策分析。⁹ 鑒於相關移民的規定和政令相當繁瑣，為了使研究聚焦，本研究是以公民身份政策為核心的移民政策出發。

本研究所指的公民身份政策，視為一種漸進的過程：從外國人初入境到歸化、取得身份證的這段過程中，將經歷不同階段的身份調整，包括居留、永久居留、正式公民身份的三個階段。本研究將「公民權利」切割成社會權（社會福利）、經濟權、參政權三大部分，移民在不同階段會取得不同部分的公民權利（如圖一

⁸ 六大移民政策的理論途徑，可參考 Meyers (2000)。

⁹ 請參考 Meyers (2004)，在本書中分析了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和荷蘭五個國家的移民政策的歷史演進過程和主要影響因素。

化面向的整合。正因為外國人的進出與存在對上述過程有基本的衝擊與影響，移民政策制定者勢必回應民族國家以上兩個重要面向（Brubaker, 1992）。公民身份的標示就是最明顯的國家和民族如何管控、接納、排除外國移民進入共同體的最佳方式，它決定了誰是國家的成員、誰對國家負有責任、誰的權利受到國家保護，也為公民社會中的個人交往提供法律框架，同時也能享受關於公共衛生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險的經濟利益。所以，公民身份是保證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所有公民的權力平等，且有一套相同的制度保證這些權利（Bauböck, 1991: 28）。在經濟全球化所帶動起的移民浪潮，形成了穿梭大洋間的跨國社群，這些長期生活在移居國的移民對於移居國的公民身份政策也造成程度不一的衝擊和改變。

但上述的說明還無法將公民身份提出較為清楚的輪廓說明，本文是以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主要的理論依據，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所討論的許多爭議點都與移民所面臨的問題相關。

如同 Castles & Miller（賴佳楓譯，2008）的觀點，他們認為公民身份不單單只有身份的證明、護照的取得，也包含更多性質和內容，需要從公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利來考慮公民身份的內涵。Marshall（1992）在其著名的著作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對「公民身份」提出界定，公民身份是由「公民權利」（civil rights）、「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社會權利」（social rights）三種權利構成——公民權是公民社會的成員所享有的對抗國家的權利；政治權利是能對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的權利；社會權利是能夠向國家訴求照護的權利。

Marshall 的觀點雖然提出了公民身份的理論架構，卻沒有考慮到隨著社會變遷，社會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也會使公民身份的意涵產生改變。後來的學者 Michael Mann 和 Bryan Turner 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論。Faulks 在其著作中分別對於兩者的理論做介紹跟比較（陳岐、耿喜梅、肖咏梅譯，2008：105-111）。

Mann 的觀點是由上到下的公民身份理論，主張現代的公民身份是統治階級所使用的一種工具，爲了維護統治地位的需要，利用公民身份的給予以控制各種潛在的破壞力，尤用來應變中產階級的崛起與工人階級的壯大。而 Turner 則批評 Mann 過度強調公民身份作爲統治階級策略的一面，忽略了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對於公民身份的形塑，同時也批評 Mann 過份重視階級的意識形態，忘記了社會上種族和民族的差別。Faulks 指出 Turner 自己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包含各種社會劃分因素的公民身份理論，同時他跳過公民身份所隱藏的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不過無論 Marshall、Mann、Turner 都無法對公民身份的概念做出較令人滿意的定義，適用於全球時代的人員流動分析。Faulks (2000) 換個角度去界定組成公民身份的權利，他指出 Marshall 所提出的公民權和社會權利之間潛藏著緊張關係。公民權利有利於資本主義下資本家追逐財富，可是社會權利是需要國家的稅收收入來支持，會因而削弱資本家逐利的行動。Faulks (ibid: 110) 認爲 Marshall 理論中的公民權利最好被改稱爲「市場權利」(market rights)，因爲經濟財富的流動才是決定公民身份擴張或收縮的關鍵因素，尤其很明顯顯示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人們會更強調市場權利，甚至會犧牲以稅收爲基礎的社會權利。

公民身份理論同時有著普世人權與國族認同的雙重矛盾。Faulks (2000) 指出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封閉的、以國家爲中心的公民身份，國與國之間的分界，無論是空間或文化的分界，都決定誰能擁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需要跟國族認同結合，才是有意義的身份。第二種是隨著自由主義傳統的演進，才發展出普世平等的信念，這也讓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爲弱勢團體的訴求提供強大的論述力量，使他們能夠主張差別待遇的現象本身就是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損害了人性尊嚴的基礎，普世人權的看法認爲公民身份需依據居住地，而非民族色彩，必須要將民族跟國家區分開來。Faulks (2000) 結論出國家跟公民身份的根本矛盾：「國家是排他的共同體，公民身份則是普世的身份，兩者很難相容。」

而 Lenski (1984: 82) 從資源分配的觀點將公民權稱為「獨特潛在的資源」，把公民身份視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化權力分配體系，是不同分配原理之間的鬥爭促使公民身份地位由少數人獨占，轉變為絕大部分的人民平等享有公民權利 (Lenski, *ibid*: 428-430)。許多缺乏其他權利地位基礎的人和許多追求社會平等的人，常常聯合起來，設法將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其他資源降到最低程度，以提高公民權的價值。因此公民權不像其他的權力來源，不把人民分為「有」和「沒有」，尤其在較進步的現代工業社會國家，公民權是唯一為大眾同時分享的重要權利的來源 (Lenski, *ibid*: 83)。但 Lenski 的觀點有兩個缺點：第一，由於本書成書時，全球化的現象尚在醞釀，作者未能預見到移民湧入後對移居國公民身份造成挑戰的現象。移民的大批遷移，造成民族國家內部出現許多沒有享受移居國公民身份的非國族成員，而這些外國移民也成為另一波爭取公民身份的主要群體。第二，作者所寫作的社會分配體系，是屬於封閉的單一社會體系，只侷限在國家內部的分析，沒有擴及到不同國家內部社會體系的比較，所以作者的社會階層化理論無法解釋全球化移民現象所造成的階層分化。

不過本研究認為仍可從 Lenski 所提出的分配體系的概念，對於白領移民的流動現象分析有所啟發。首先，作為重要的一種制度化權力來源的公民身份，其所分配的是國家提供的公共資源，這些公共資源絕大部分是外來移民所必需的，而外來移民必須要獲得公民身份這種制度化的權力基礎，才得以進入國家的公共資源分配體系。但是白領移民卻沒有爭取的行動，也不會想要選擇移居國的公民身份，這顯示白領移民擁有其他的權力分配體系，能夠讓他們得到想要的資源。

二、 移民對公民身份理論的衝擊與修正

由於當代民族國家的鞏固使得公民身份穩固下來 (Brubaker, 1992)，但逐漸

增多的移民會對這種穩固的公民身份造成挑戰，隨著移民在移居國停留時間增長，若其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仍付之闕如，會對移入國造成漸增的政治問題。現有的公民身份理論只關注在規範層面的討論，公民做為單一共同體的成員，規範性的權利與責任，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缺少對於移民在移居國長住之後的所應具有的權利與責任為何？

Brubaker (1989) 是最早將公民身份的重點放在移民的經濟、社會等實質權利的學者，主張以成員身份 (membership) 這個更廣泛的概念來理解這個趨勢。成員身份是關於人在某一國家居住以及工作並發展出越來越多的社會性關係事實 (曾熾芬, 2008)。Brubaker (1989) 認為大部分的移民比較不在乎公民身份中的政治面向與意涵，經濟、社會層面的參與才是他們最關心的權利。也因此為移民設計成員身份制度政策時，逐漸有採取將公民身份 (政治面) 與權利身份 (社會經濟面) 區分的趨勢，也因此成員身份的概念會比公民身份，更容易理解當代移民所擁有的各種身份狀態與相應之權利義務。許多國家設計出一種賦予移民除了政治權之外的成員身份權利，此被 Tomas Hammer (1989) 稱為「準公民身份」(denizenship)，通常以永久居留權的方式賦予。當一個移民作為 denizen，其成員身份特徵是介於已經歸化移居國的公民與上處於短暫居留的外國人之間。

三、 世界公民的建立與挑戰

全球化所帶起的大量移民現象，對公民身份造成挑戰。Faulks 在著作 *Citizenship* 也討論到全球化對公民身份性質的轉變 (Faulks, 2000: 132-161)。Faulks 認為當今需要超越傳統的安全觀念去重新塑造公民身份。他不認為普世人員的主張完全取代公民身份。因為國家治理與政治課責性的需要仍視須以公民身份為基礎。但是持世界民主 (cosmopolitan democracy) 觀點的學者們希望能夠加強全球民主治理機制，來建立一種「世界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概念。

然而 Faulks 從歐盟欲建立歐洲公民的經驗來看，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試圖創造歐洲公民的努力失敗，仍然無法切斷國籍跟公民身份的關係。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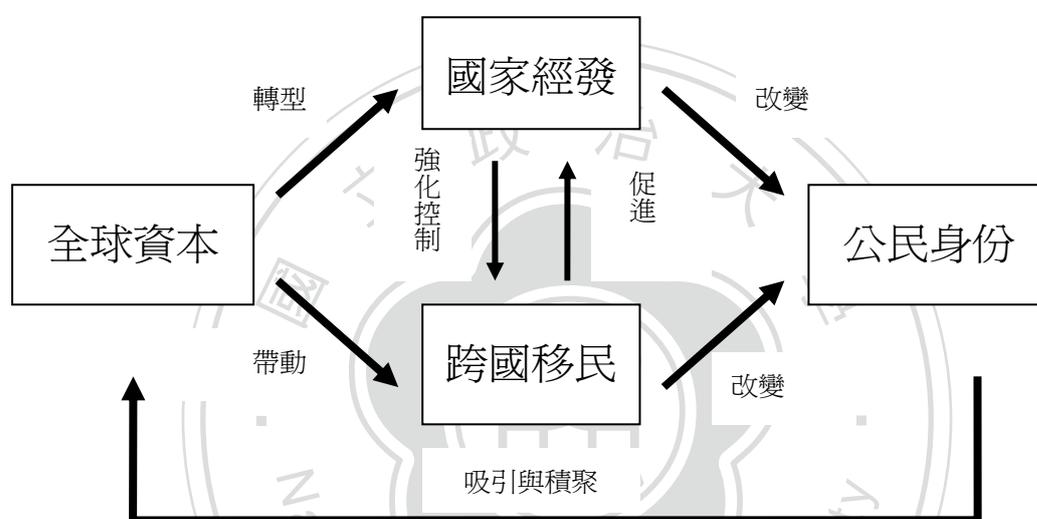
四、 移民的行動邏輯：彈性公民身份觀點的提出

但不管公民身份或者是成員身份，公民權利理論是以國家為分析單位，依照著一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前提假設：移民都是準備在移居國落地生根，爲了要被「同化」、「整合」到移居國社會中。相反的，跨國主義觀點則強調超越「國族主義的方法預設」（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誠如 Wimmer 與 Glick Schiller 指出的，受到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的思維限制，所以習以「視民族化界定的社會領域爲自然的分析單位，把民族國家自然化的傾向，因而生產出容器式的社會觀點，在這個社會中，包含一種文化、一個政體、一個經濟、和一個限定範圍的社會群體」（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3: 579）。因此，跨國主義觀點，傾向不將「移民」視爲一個整體，而凸出其具有高流動能力的白領移民來看，對跨國移民而言，獲得移居國的經濟權、社會權利並不是首要考量，他們所在意的是如何維持他們跨界流動的便利性，並且能依據自己的行動邏輯流動。

根據這個觀點的所發展出來的研究，以王愛華（Aiwa Ong）最具啓發力。Ong（1999）從對華裔的跨國行動邏輯的研究中，提出所謂「彈性的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國家與移民皆將公民身份視爲一種能聚積資本與權力的工具。Ong 認爲全球化造成資本主義的轉型，在「晚期的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影響下，彈性的資本積累方式主宰了商業哲學、財務金融、生產體系、勞動市場與消費的模式，讓跨域的企業活動「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往邊陲地區設置的工廠、重新建構的銀行與投資關係，這些適應策略刺激了新的全球生產、金融和行銷方式的形成。這種改變也使得個人和政府必須發展出對於

¹¹ 不過，Faulks 認爲，公民身份已經無法再如以往與封閉、排外的政治社群維持緊密關係（Faulks, 2000: 161）。

公民身份和主權的彈性思維，以做為累積資本和權力的策略（影響過程如圖二所示）。後發國家將公民身份視為控制移入者的手段，是細緻化的疆界重塑過程；移民將公民身份視為欲追求最佳生存利益的行動策略。Ong 以華人的海外離散社群為研究對象，從東南亞的華裔與在美西的港裔的經驗出發，指出他們是依據自身的行動邏輯，彈性利用不同的公民身份到不同地方尋求經濟利益或者是政治安全感。



圖二 全球資本對公民身份的轉變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Ong 指出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影響了公民身份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跨國移民兩方面不同意義的轉變，但卻沒有詳細說明移民所根據的行動邏輯是如何被決定出來的，因此本文在下一個小節先從過往的移民研究中去尋找決定行動邏輯的相關線索。

第三節 未受深入討論的人員流動因素

既然流動能力是解釋白領移民跨界行動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需要先定義

「流動能力」，以及相關的評估指標。2009年十月發布的以移民為年度主題的聯合國發展報告中將「人員流動能力」(human mobility)定義為「個人、家庭或團體有選擇居住地的能力」，這不同於「改變一個人居住地的行為」的「人員流動」(human movement)」(UNDP, 2009: 15)。「人員流動能力(human mobility)」更強調個人、家庭或團體的「選擇能力」。本研究認為此定義雖然點出「流動能力」的行動者能動性，但它仍然過於寬泛，無法提供可深化相關研究的具體指標。「流動能力」往往是多重因素促成，下文將整理傳統移民研究中的人員遷移因素，以更具體擴充「流動能力」的內涵。

一、 當前移民研究所討論的人員遷移原因

以往的移民研究對於人的遷移動機做了許多的討論。最早的移民理論，是推拉效應(push-pull effect)，由於經濟景氣的循環，導致景氣低迷的國家形成國內的「推」力，將多餘的勞工送往景氣好、勞工需求多的國家，景氣好、勞工需求多即是「拉」力(Thomas, 1973)。所以，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成。「推力」(push)和「拉力」(pull)為個人在理性思考下評估「成本-效益」(costs-benefits)的平衡，並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優先原則，經濟的獲利變成遷移最原始的目標(Ma, 2000: 152)。但推拉效應並不是深入、細緻的理論，移民的遷移行為與流量是許多複雜的因素互動而成的結果(盧倩儀，2006：212)。

從分析單位可以區分為個體與結構因素兩大類。從個體因素分析的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移民理論，又被稱為「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是把移民單獨視為具有理性選擇能力的人類，會對可行的選擇方案做審慎的評估，遵循以薪資水準的基準的利益最大化和最容易找到工作的原則選擇遷移的目的地(Ma, 2000: 152-153)。結構因素是指移民被周遭環境已身無法左右的力量(可能是經濟、社會或政治問題)，把人們從一個國家推擠到另一個國

家，如同新馬理論（Neo-Marxist）指出的，遷移行為本身蘊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不平衡的流動方式，非個人意志可以左右，更宏觀的因素，如國家之間經濟、發展力量上的差異產生遷移的不平等（Ma, 2000: 157-160）。

不過強調純粹經濟因素的理論，無法反映決定人們決策的更廣泛的社會結構的作用；反之，過度強調結構的制約，忽略了人們決定遷移的能動性。事實上，如同新制度經濟學家所指出，人無法達到「完全理性」，人們的選擇是在既定結構限制下所展現的「有限理性」（Ma, 2000: 160-169）。於是，接下來發展出兼顧個體與結構的移民理論，分別是以「家庭／家族」為分析焦點的「新移民經濟學」，與運用社會資本概念的「移民社會網絡」理論。「新移民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的學者強調「家庭／家族」才是決定的移民與否的「單位」，而非個人能決定的（盧倩儀，2006：214-215）。在分散風險的考量下，家庭／家族能夠讓不同的家庭／家族成員到不同地區、國家的勞動市場，並將賺取的薪資匯回家鄉。「移民社會網絡」理論最先源於 Charles Tilly 從社會資源的角度觀察移民現象，以「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形容移民帶動更多移民的現象（Tilly, 1978: 53），而 Bourdieu（1986）更清楚描繪出此「連鎖移民」的圖像。移民社會網絡中的人際關係將移入國以及家鄉之舊移民、新移民、潛在移民以及非移民都串連起來，這些移民社會網絡的存在與成長大大降低新移民移居他鄉的成本，對新移民而言，社會網絡幫助他們克服困難移居他鄉、幫助他們找工作和賺取較高薪資。

上述的理論從不同層次（如個人、家庭、網絡、總體經濟）的解釋因素，來解釋移民現象，但他們皆是以「單方向」——移民從原生國前往移入國，從開發中國家到已開發國家——來解釋移民的流動行為，然而現今的跨國移民已不若以往的單方面流動遷移，而是具有持續性、雙邊或多方的跨界流動行為。更進一步言之，需要具有持續性跨界流動的能力，才能進行持續性跨界流動的行為。換句

話說，必須要先討論移民的流動能力之來源，才能為移民的流動行為研究提供更佳的解釋。

單就跨界行為而言，能夠進行跨界行動的移民都具有某種程度的流動能力。這些跨國移民都不會是原生國的底層階級（因為真正的底層階級連溫飽的能力都沒有了，何來其它資源跨越國境），而白領移民跟藍領移民不同的是，白領移民擁有更強且持續性的流動能力。藍領移民的流動，無法很自由地說走就走，說搭飛機就搭飛機。就如同描述低階台人移民日本的記錄片《新宿驛，東口以東》，和講述土耳其移民遷移德國的電影《希望之旅》一樣，這些移民都將所有家財集中於孤注一擲的遷移決定，他們無法持續性地展開跨界流動的行為，並有強烈地在移入國落地生根的打算。而白領移民卻擁有許多優勢，能夠很積極地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決定何時和如何從事跨界行為。

二、 台商的流動能力

曾經聽過一位台商的經歷：他的公司之前總部在上海，之後遷移在廣州去，在總部遷移之前都是上海和廣州兩地跑，有時因生意需要會前往越南，而在公司於孟加拉設廠之後，他也必須不時到孟加拉視察當地的工廠，之前就遇到了孟加拉的軍事政變，還好一切平安無恙。這樣子類似的台商到各地開疆闢土的故事常常不斷出現在訪談的過程中。而在不少研究台商的文獻中，其實都隱隱的指出台商的高度流動能力是其重要的特徵，也是台商的生存策略。

但以往的研究對於台商的流動能力僅當成一種理所當然的跨界特徵，最先出現的是從經濟資本流動的角度去描述。「一只皮箱走天下」傳神地形容了台商（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台商）的對外開創事業的冒險精神。蕭新煌與龔宜君（2000：19）將這種精神稱為台商的「外向性」性格，這種外向特性顯示出「台商勇於在不同的民族國家領土之間流動以尋求跨國的利益」。曾熾芬（Tseng, 2000）的研究成

果則是從彈性公民身份的角度解釋台商他國國籍的取得是利於資本累積的工具。她認為台商的移民型態是屬於連結資本流動所產生的移民型態，不少台商擁有第二本護照，但目的是要做為資本累積的手段，以避免投資地對外國人的種種限制。這種移民形態有別於傳統移民研究的範圍。而龔宜君（2008：129）則以「生成於亞洲的新興跨國資本」為題來形容台商的跨界投資、生產的行動。

當台商跨國資本的運作逐漸成熟，也伴隨著愈來愈開放的疆界與多樣化的交通方式，台商經濟網絡，已經快速轉變成為持續不斷增長的跨國社會場域，對於台商的研究不能只侷限在個人經濟資本的投資者角度，需要從台商跨國社群的跨國移民方向去理解。

台商往往具有「多重的跨域聯結」（耿曙，2008），對中國大陸台商而言，一方面由於兩岸的邊界容易貫穿，並且台商的經濟優勢使他們往往具備高度的流動能力，加上發達的科技克服距離的障礙，縮減了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這使得台商的跨界流動成為常態，能夠同時維持兩地社會的連結（耿曙，2008；鄧建邦，2009）。雖然台商的經濟優勢確實讓台商擁有高度的流動能力，但仍不足以解釋為何要「持續性」跨界流動，現有的學術研究裡對大多數台商持續跨界流動的現象，明顯討論不足（鄧建邦，2009）。鄧建邦指出台商跟傳統移民研究所認定的移民不同，「被同化」、「整合」並不是台商進行跨界流動的動機，台商的跨界行為遵循的仍是依據個人利害的衡量為主（鄧建邦，2009：153）。應把台商視為是一群跨界流動的行動主體，觀察他們實際的行動經驗。

三、 小結

本研究認為若僅從狹義觀之，個人能力的強弱即反映出流動跨界的能力強弱。但個人能力無法完全解釋跨國移民「持續性」流動現象，並且維持跨國社會

場域的原因。個人能力是必備的流動能力基礎，可是仍需考慮到不同層次（如個人、家庭、網絡、總體經濟）的解釋因素，才能更充分說明跨國移民的持續性流動現象，以及其流動能力的具體內容。而本研究將在下個小節說明依據前述文獻回顧的成果所建立的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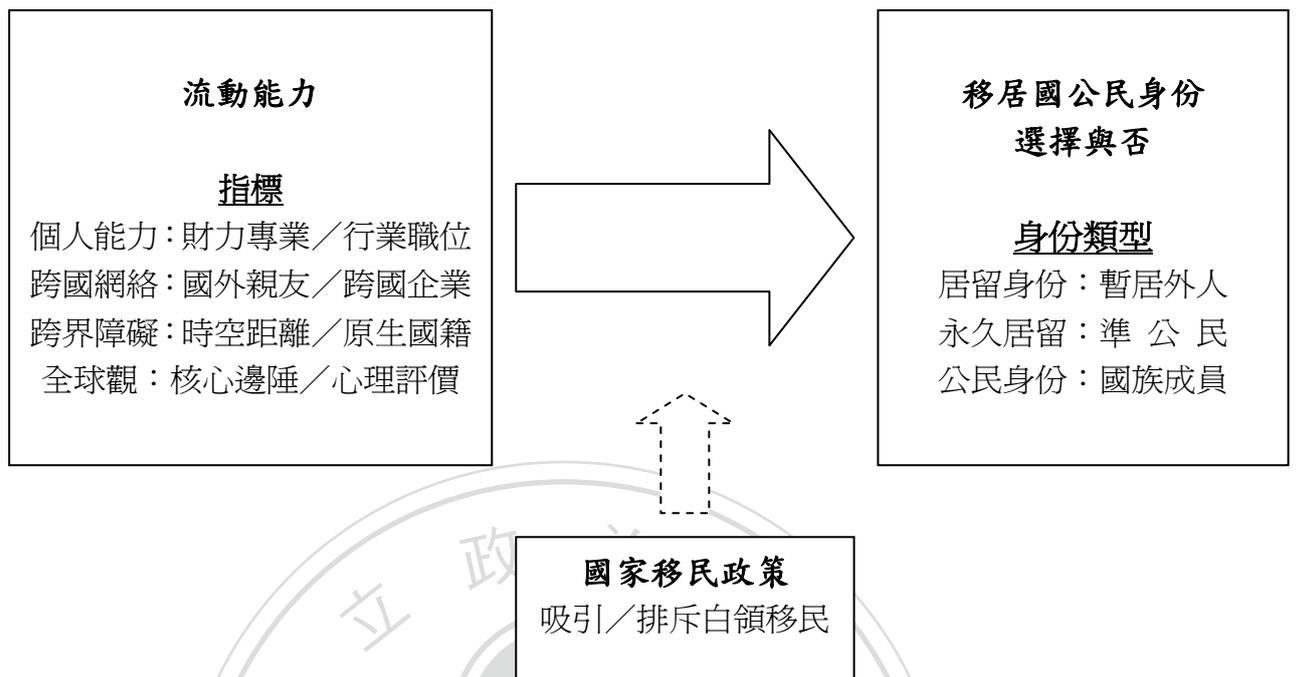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經驗性研究，在回顧了相關文獻，找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後，本節會介紹所使用的研究架構、概念的界定。以下將先介紹研究架構與相關概念。

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 本研究分析架構

本文所研究的問題為白領移民的流動能力是否影響到其對移居國的身份選擇。在本研究中，移居國是指本論文的研究場域中國大陸上海市。本研究‘是假設白領移民的流動能力高低對於中國大陸的公民身份選擇與否有相當的影響。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三所示：



圖三 本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 研究概念說明

本研究對於「流動能力」設定四種指標，以使抽象的「流動能力」概念能藉由此四種指標加以具體分析，有助於不同情境之下「流動能力」內涵的解釋。衡量指標的排序由微觀個人到宏觀結構依序排列：個人能力（財力專業／行業職位）、跨國網絡（國外親友／跨國企業）、跨界障礙（時空距離／原生國籍）、全球觀（核心邊陲／心理評價）。在本研究架構中，流動能力需要從四個指標加以綜合評估，才能窺其具體形貌。此四個指標分別為個人能力、跨國網絡、跨界障礙、全球觀。以下先簡介此四個指標：

1. **個人能力**：為微觀的衡量指標，個人所擁有的資源，決定了流動能力的強弱。此指標從個人的財力、專業能力、所從事的行業性質與所擔當的職位，加

以具體衡量個人在進行持續性跨界流動過程的能力高低。

2. 跨國網絡：是中層的衡量指標。從前述所提的「新移民經濟學」和「移民社會網絡」理論可知跨國網絡的形成可以始於移民原生國的家庭／家族分散風險的考量而啟動，並且藉著與國外既存的移民社會網絡之連結進一步強化，同時也融為移民社會網絡的一部份。跨國網絡的存在會促進持續性的跨界流動行為，而本研究所指的「跨國網絡」包括國外親友之跨國社會網絡，以及企業之跨國經濟生產網絡。

3. 跨界障礙：是總體的衡量指標，表示從事跨界流動的通行難易度。全球的人員流動模式與人們流動都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的想法，但是人們的流動嚴重也受到各種障礙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包括原住地和目的地政府的政策以及遷移者個人所擁有的資源（UNDP, 2009: 20）。本研究已將「遷移者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單獨歸類為「個人能力」的指標，因此此處的「跨界障礙」是指跨界距離的遠近、跨界流動所需的時間，並從白領移民原生國籍的護照申請簽證的難易度具體代表國家之間的國境管制對於人員流動的限制或加速。

4. 全球觀：誠如新馬理論的學者指出遷移行為本身蘊含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或不平衡的流動方式，此代表「流動能力」隱含著「往哪裡流動」的方向性考量。這裡的全球觀必須考慮外部與內部兩種觀點對於白領移民流動思惟的交互影響。外部的影響是目前以美國、西歐為核心國家，再依次以文化、經濟發達程度、生產技術高低為半邊陲、邊陲層級秩序的世界體系；內部的影響為白領移民對於移居國的心理評價之高低優劣、位於邊陲或者核心的位置。所以核心與邊陲的全球觀，可分為「經濟發展」與「文明程度」兩大類評價，會影響移民的流動方向與移民心理評價的高低優劣。

對於移民的流動能力評估，本研究認為可以綜合此四類指標分三階段評估。在第一階段是需要檢視移民是否有流動能力，個人能力的指標表示了移民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而跨界障礙的指標表示了國家樹下的政策障礙與篩選標準。個人能力與跨界障礙為必要的基本指標。如果移民有足夠的個人能力，其持有的護照能遇到較少的跨界障礙，那代表已經具有一定強度的流動能力。

但是光具有流動能力不夠，對於白領移民而言，還需要跨國網絡做於持續流動的觸媒。所以第二階段，就是要看移民有沒有跨國網絡，能讓移民有需要或意願保持持續性、多次的跨界流動。第三階段是考慮流動的「方向」，也就是移民本身的「全球觀」，會增強或減弱移民的流動意願。「經濟發展」與「文明程度」兩大類評價會交互影響，尤其當某地區出現有兩類標準的落差時，最容易使移民增強跨界流動的意願，往來於不同發展程度的區域滿足所需。

第三章 上海市台商的身份選擇考量與流動現況

台商能不能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這往往成爲台灣的政治問題與新聞焦點。¹² 曾熾芬、吳介民（2008：15）的研究指出大陸在集中換發二代身份證的情況，允許台灣居民擁有雙重身份證。他們爲了再確認這樣規定，還特別請了一位台灣移居者寫信給公安局局長確認，對方的回覆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不承認台灣的身份，既然不承認，也就沒有所謂放棄的問題。」而她們向陸委會法政局請教，該處人員表示，多起被發現具有雙重戶籍而被取消台灣戶籍的情形，都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入台灣時才被發現，否則台灣當局也無法查證誰有拿。中國大陸不再堅持單一戶籍的規定，再加上台灣的政府並沒有辦法真正查明誰擁有雙重戶籍，曾熾芬、吳介民（2008：15）推論這可能會發生台灣人擁有雙重戶籍的情況。

回到本研究在 2009 年於上海田調時，問及有沒有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時，絕大部分受訪者的第一個反應是「沒有需要拿」、「沒有太大的需要」。其中一位受訪者很直接了當的說，需要拿中國大陸身份證的人，只有那些沒有辦法回去台灣的人：

來這邊的台灣人不會有人想要拿這邊的身份證……只有那些沒有辦法回去台灣、被台灣法院通緝躲在大陸的人，才需要拿這邊的身份證，可是中國大陸不可能給他們的。（訪談對象 S090823-39）

然而是否真的有台灣人擁有雙重戶籍現象，實際的情況到底爲何？這很難從

¹² 《台灣當局恐嚇 台商觀望大陸身份證》，來源：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 年 04 月 03 日，檢索日期：2009 年 05 月 03 日，網址：<http://news.sina.com.cn/c/2006-04-03/09488599155s.shtml>。由於中國大陸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在記者會上回應記者的提問透露，台灣同胞可以申領內地的身份證，但必須遷入內地定居，且要辦理內地的常住戶口。時任民進黨政府的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威脅說，台商一旦選擇申請中國大陸身份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喪失台灣居民的身份證，連帶所有在台的權利，未來返台需要以大陸人民身份申請。幾天之後，在陸委會的網站上宣布，已經有 23 人因領取大陸身份證而被註銷台灣戶籍。

的訪談中得到足夠的證明。不過當問到假設性的問題，能夠保有台灣護照的前提下，願不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就出現了願意考慮的聲音。而回答願意考慮的受訪者，在一開始只有詢問會不會想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時，也都說出類似於「我是台灣人，不會想要拿」的回覆，但是在這個假設性的問題上，卻又改變了先前的態度。這種前後不同的反應，是相當值得更深入去討論他們回答轉變背後的思考邏輯。

本章先從有代表性的訪談個案的故事敘述著手，描述他們考慮身份選擇的歷程。次之，從宏觀的角度描述本研究對上海市台商的流動現況觀察，提供生活背景的資料補充。最後第三節為本章的小結。

第一節 上海市台商身份選擇的不同考量¹³

本研究於此節先從研究問題「假設可以保留台灣護照，願意或不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身份證」的不願意或願意考慮兩類回答為初步分類，而在此兩類中本研究會依受訪者的不同背景與選擇考量做為較細的分類。

壹、 不會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

對於本研究的問題「假設可以保留台灣護照，願意或不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身份證」回答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的受訪者可大約歸類為三類考量：第一類為堅持本身的台灣人認同；第二類為受訪者擁有雙重國籍；第三為受訪者自身擁有多國跨國經驗，上述三類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必要考慮這個問題。以下各舉出代表性的受訪者為例：

¹³ 本研究呈現所有在田野中的受訪及接觸研究對象的姓名、所屬單位都經匿名處理。

一、 堅持本身的台灣人認同

這類的受訪者堅持自身的台灣人認同，他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考慮是否要拿中國大陸身份證的問題，不過他們對於子女的身份選擇安排卻有不同的想法。

林安（訪談對象 S090730-05）是在九零年代末觀察到中國大陸的積極建設，看好未來的消費市場潛力，決定在兩千年初進軍上海市的服務業開創事業（總經理），並且主攻高收入的顧客群。他於 1999 年全家遷居上海市居住已有十年的光景，但在遷居上海之前，林安已經有多年在國外闖蕩事業的經驗，並且都在不同國家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也有取得這些移居國的國籍（林安的家人也都擁有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多重國籍）。移居過許多國家後，林安說自己像是無根的浮萍，從小生長的台灣是他懷念的家鄉，林安認為自己台灣人，也一直告訴子女他們是台灣人，他曾經幫過國民黨的候選人站台。不過他也很享受在上海的生活，認同上海這個充滿冒險機會的城市，並且在此地的朋友圈中上海人多於台灣人，但林安認為兩岸維持現狀是最能夠從中獲利的。對於本研究的問題，林安不會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也拒絕過上海市市政府要頒給他的「榮譽市民」（同時可獲得上海市戶口）。相反的，對於子女身份選擇的看法，他會鼓勵子女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也讓他們從小念當地的名校去發展五同關係¹⁴。如今林安的子女皆到英語系國家深造，但他們所交往的對象都是上海市政商要人的子女。

慧姐（訪談對象 S090803-13）跟高大哥（訪談對象 S090803-14）是製造業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在 1999 年帶著全家跟隨大廠西遷到現在這個工業區。全公司只有他們夫妻兩個台灣人，高大哥擔任總經理，慧姐掌理財務，節省人事成本考量下，都是請陸幹。高大哥與慧姐都覺得他們是被迫遷往大陸發展，期望尊嚴跟經濟謀生都能夠兼顧，但若在上海市真的待不下去的話，會考慮前往其他國家

¹⁴ 五同關係指的是「同好、同姓、同鄉、同校、同事」的人際關係。

發展，像是有親戚待過的越南即是在考量之列。雖然慧姐對當地人的文化素質印象很差，但她也是需要結交當地的官員，利用當地的人脈來幫助做事。高大哥也對當地人的文化素質印象很差，可是他表達會因為經濟發展逐漸認同上海市，不過自己還是台灣人。慧姐跟高大哥認為兩岸要經濟互通，希望同時仍保有主權，認為台灣不可能獨立，維持現狀是目前最好的選擇。對於本研究的問題，高大哥跟慧姐皆表達就算有機會也不會考慮，之前也有朋友叫他們拿，但是他們認為沒有這個需要。對於子女的身份選擇，兩人都對子女強調台灣人的身份，不希望子女將來的男女朋友是當地人，但在學費跟通車距離的考量下，捨棄在東莞需住校的台商學校，選擇離工廠近的當地小學。不過慧姐認為還是要鼓勵孩子融入當地，而高大哥表示如果子女之後決定要留在中國大陸發展，他會跟著他們留下，不會回台灣。

張爸爸（訪談對象 S090802-11）與小張（訪談對象 S090802-12）是父子。張爸爸是製造業大廠被派來上海市開墾的先驅幹部（1994年抵上海），在廠裡擔任中階的管理職位。張爸爸剛來上海市時因為環境不好，一開始不想帶全家過來，可是他會遺憾錯過跟孩子相處的時機，等到來大陸七年後，上海市的居住條件轉好，決定全家都過來（2001年）。張爸爸認為上海市比台灣更有發展機會，所以選擇當地學校讓子女就讀，結識當地朋友，融入這邊的生活，因為經濟沒有辦法負擔，外國也沒有親戚，加上又捨不得小孩出國，就沒有把小孩送國外。張爸爸端視子女是否留在大陸發展決定要不要回台灣養老。小張是念上海市知名大學的醫科，是同屆班上唯二的台灣人，原本他在高中念書時對於當地人有著素質不好的偏見，可是上大學後，有感受到不少大學當地同學水準不錯，也比較能跟他們聊得來，而扭轉了他的既有偏見。小張會選擇留在大陸發展，但是更希望能前往亞洲其他國家工作。對於本研究的問題，張爸爸跟小張都不會選擇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不過小張表達了他的矛盾，一方面他希望統一，能夠來往兩岸找工作，他的機會會更多（他考量到目前台灣不承認中國大陸學歷，這讓他無法回台

順利找到工作)，可是他又不希望被中國大陸統治，兩邊思考後覺得維持現狀是最佳的。

二、 擁有雙重國籍

對於本研究的問題，王晰（訪談對象 S090801-10）不會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因為他已經有雙重國籍。王晰是三十出頭的餐飲業老闆，已經開了三家分店在上海市的精華區域，他的太太是在北美留學時結識的大陸人，育有一對稚齡子女。王晰住過台灣十五年，高中就前往北美留學，在北美的不同城市移居，共待了十三年，之後因為看好上海市的發展來到上海生活數年，其中又有機會在北京待了半年。王晰因為從小的留學生生活，讓他能夠很好適應移居生活，（除了人文素質以外）到處都可以融入，但他也表達在哪裡都沒有家的感覺。王晰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但不贊成統一，覺得統一後台灣人會失去原有的優惠。對於子女的身份選擇，他沒有明白表示看法，但是不反對女兒將來嫁給當地人，只要對象是擁有好的文化素質。而王晰也希望子女將來能念當地學校，結交當地朋友，之後大學能出國念。

三、 擁有多國跨國經驗

如家君（訪談對象 S090804-23）跟弘鑫（訪談對象 S090806-29）一般擁有多國跨國經驗的受訪者，也表示沒有必要考量要不要拿的問題，他們拜訪生活在不同國家的朋友，享受在不同國家的生活。家君跟弘鑫都在同家製造業大廠擔任高階主管，他們夫妻因為公司的政策，在 1999 年一起前往上海市任職，弘鑫之後長期待在上海市，家君則在兩年半後被輪調回台，之後都是穿梭兩岸，一直到 2008 年年中才再度長住上海市，不過他們的小孩從 1999 年過去後就一直待在上海市。弘鑫是本省人，而家君是外省第二代，家君的父親曾多次回大陸探親，家

君都沒有應父親之邀一起回鄉探親，但是聽聞父親的經驗，對於大陸人的觀感不好。家君跟弘鑫到過很多地方，他們的老大是在馬來西亞的時候生的，老二是在上海開廠的時候生的，台灣對他們還是有家的感覺，卻是上海市的過客。家君的小叔居住在馬來西亞，而且家君喜歡馬來西亞人的淳樸、善良，每隔兩、三年，就會去看那邊的老朋友。他們夫妻倆都從上海市不斷的建設和蓬勃的經濟榮景感受到中國大陸跳躍式的成長，文化素質卻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對於本研究的問題，家君跟弘鑫都不會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雖然他們傾向統一，但認為這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的，需要從交流開始，因而維持現狀是最好的。對於子女的身份選擇，家君跟弘鑫並沒有特定的想法，他們可以接受子女的選擇，也能接受子女跟文化程度不錯的當地人婚嫁。

貳、 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

對於本研究的問題「假設可以保留台灣護照，願意或不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身份證」回答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的受訪者可大約歸類為三種不同考量：第一為決心要在大陸發展；第二為時勢所趨；第三為希望享有移居國的福利及國民專屬權利以方便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生活。以下各舉出代表性的受訪者為例：

一、 決心在大陸長期發展

此類受訪者對於台灣目前的停滯不前皆有一定程度的危機感，並且評估中國大陸一定是未來發展機會的必爭之地，爲了要搶得先機，他們決意要在上海市生根發展。

易文（訪談對象 S090814-36）是在 2000 年初來到上海市念研究所，他表示在這邊也是可以找到深交的朋友，但需要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打進去他們的關係，而且最好從校園開始發展這邊的關係，現在他也有很好的當地朋友，是那種一有事情就願意全力幫忙的朋友。在畢業後，易文有經歷過只有工廠和宿舍兩邊跑的台幹生活，可是他覺得這樣不行，而且他觀察到由於現今六、七年級生的當地人才崛起，使得上海市的中階台幹逐漸失去優勢。易文在來上海市一開始還會關心台灣的政治，可是來這邊五年後沒有看到台北有任何進步，上海市已經是國際化的大都會，台北市卻非常的 local。從以上他的觀察，讓易文下定決心要在上海市發展，這讓他希望能夠累積在內資與台資企業的工作經歷，儲備更豐富的工作經驗與人脈關係，幫助之後事業生涯更加順暢。在談到願不願意考慮成為中國大陸的公民，易文語帶無奈的表示「並不是因為光榮，是迫於無奈選擇做中國大陸的國民，是看哪邊狀況好，只好到哪一邊去。其實台灣人就是在這邊的少數民族，這邊的種族歧視很明顯，就是大中國思想對少數民族的看法。」易文現在還未成家，但他希望將來小孩的學齡教育要在台灣打好品德基礎，等小學畢業後接來大陸念當地學校發展五同關係。

二、 時勢所趨

持這個考慮理由的受訪者往往是由於登陸之後，親眼見證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他們也認知到要把握中國大陸的發展機會，但並沒有像前類受訪者擁有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決意，而是觀望世界整體時勢發展的風向而定。如同下列洪大哥、虞太太的例子：

洪大哥（訪談對象 S090731-08）是在製造業大廠擔任協理（中階台幹），負責代表公司接待客戶、與各種協會交際，和協調公司與基層員工之間的管理。洪大哥是因應公司的調派，在 2001 年帶著全家遷往上海市。雖然子女就讀當地國小（學費便宜跟交通方便兩種考量），洪大哥要求孩子在家要講台語，在學校說普通話，而孩子們自己也學會了一點上海話。洪大哥認為文革的破壞使得上海人的文化素質低落，但他很看好這邊的景氣，充滿很大潛力的消費市場，同時卻也擔心中國大陸的強大會使當地工資提高，不利於以外銷為主的公司經營。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來襲使台幣貶值，不僅讓公司的業績不佳，也連帶使他的薪資待遇縮水，可是他仍需要負擔一家兩大兩小在上海市的生活開銷。對於本研究的問題，洪大哥語帶保留表示要看時勢來考慮，他認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的逐漸進步是必須面對的現實，應該要跳脫出來以往侷限在台灣教養下所接受的東西，政治並不是二分法，有些事情也不是絕對的。而對子女未來的身份選擇，洪大哥並沒有明白表示看法，只是說不會去管小孩子的決定。

虞太太（訪談對象 S090804-22）是 2003 年來到了上海市，因為丈夫經營的工廠隨著製造業大廠遷移，她們全家也跟著遷往上海市。虞太太是掌管工廠的財務，目前公司業務內外銷都有，但主要是接台商的生意。她認為以世界的視野來看，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一定比台灣好，所以她讓小孩念當地學校來融入當地，發展與上海市同學的關係以把握未來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機會。一開始研究者只有問到願不願意考慮作中國大陸的國民，虞太太的回應典型反應了一種理性計算後的轉折「不會想要拿這邊的身份證，但是如果這邊以後跟台灣一樣，可以到各國通行，那我會考慮。而且這邊的保險也做的不錯，臺灣都沒有去宣傳自己的保險啦，這邊都有傳達給大家知道」。而當問到「有不放棄台灣護照的機會」的假設性問題，虞太太很明確的回應會考慮。

三、 享有移居國的福利及國民專屬權利

此類的受訪者有些是已經久居當地的台商，他們希望在上海的生活能因為擁有某些當地人專享的權益而更加便利，並且也能方便他們在上海市就學的子女能享有某些學雜費方面的優惠。而另一種則是屬於從台生身份轉換成台幹身份的受訪者，由於這些從學生時代就深入上海市日常生活的受訪者遠比他們已具有經濟優勢地位的父母更需要某些當地福利或權利，以幫助他們更融入上海市的市井生活，如下列的隆興即為代表性案例：

隆興（訪談對象 S090813-33）是 2001 年（十八歲）自願跟隨經商的父母來到上海市生活。他就讀當地的高中和大學，在大學畢業後，認為上海市比台灣更有發展機會，遂留在上海市的某家傳統台資企業當中階台幹。在上海市八年的讀書經驗，他感受到上海市很多的進步，可是文化素質仍沒有台灣好，仍有段差距，可是他跟大學同學良好的互動，讓隆興認為還是可以找到（文化）程度相仿的當地人深交，而待在上海的這幾年，也讓他漸漸融入當地人的生活。隆興在食方面還是選擇學生時代能負擔的消費，而他在住房上是跟當地朋友合租房子，也沒有裝小耳朵，顯示目前他的薪資所得並不優渥。隆興有想過要拿這邊的身份證，後來沒有這樣做，因為放棄台灣的護照，回台灣不方便，而且台灣的護照出國很好用，很容易拿到其他國家的簽證。不過當問到「如果可以不放棄台灣的護照」的假設性問題，隆興會考慮拿：「我會考慮拿。現在的港澳台居民，權利是少於中國公民的，如果能更多權利當然是最好，能夠做更多的事情，像是放寬投資股票的限制、可以貸款買房子。會覺得這邊不給港澳台的人更多的權利，是跟政策有關，因為政府是保護 local 的中國公民，港澳台的定位是在模糊地帶。需要的是買賣股票的權利、投票權，其實醫療保險的話，這邊的醫院也愈來愈多事可以申

請健保給付。」隆興希望能夠享有移居上海市的福利及中國公民專屬權利，以便利他在上海市的日常生活與經濟交易。

第二節 上海市台商流動現況

第一節分別舉出代表性的受訪案例以說明本研究個別受訪者在選擇身份的不同考量，而在第二節，將從宏觀的角度描述本研究對上海市台商的流動現況觀察，提供受訪台商跨界流動生活的背景脈絡的資料，補充前述微觀的個人考量所受到的結構性影響。首先受訪台商雖然是被迫登陸求生存，但由於整體的收入與薪資提高，而在大陸的消費水準仍偏低，這使得受訪台商能夠獲得比台灣較佳的物質生活；而目前受訪台商都是屬於仍需要每年換簽的居留身分，常須返台利用在大陸生活缺乏的社福資源。最後，本研究說明部分受訪台商在考慮到旅行跨界便利性上的四種考量情境。

壹、 被動登陸尋生機，獲得比在台灣較佳的物質生活

本文的受訪台商大部分是屬於製造業，流動遷至中國大陸經營事業，對於他們的生存尤其重要。一方面台灣的工資上升，企業的經營條件惡化，使得大廠西遷以降低成本，而這像提肉粽一樣，其他依靠大廠訂單的小廠也必須跟著西遷；

我會遇到有人問說為什麼你們要去大陸？你看就是因為工廠都到大陸去了，這邊的經濟景氣也跟著不好，原本十幾年前要台北高雄之間常常可以看到貨櫃車跑來跑去，可是這幾年，高速公路上的貨櫃車少很多。談很多都很傷感，可是我們是因為大廠過來，我們也只好跟著過來……其實我們來這邊是迫不得已的，很無奈。如果只是用一個字形容我們的心聲的話，那就是「幹」！（訪談對象 S090803-14）

另一方面，對於在台灣缺乏市場的產業來說，他們登陸也找到了廣大的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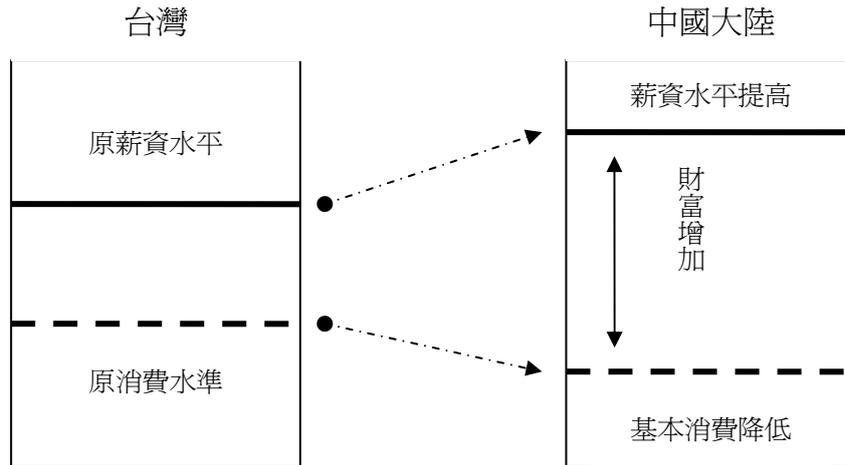
和生機，免於在台灣成爲夕陽產業而面臨關廠的命運：

我這邊有很多產品是台灣沒有市場的，像是之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事件，我有在做檢測三聚氰胺的儀器，可是台灣的牛奶市場太小了，買不了多少這些牛奶製程要用的機器，可是大陸這邊的需求很大，市場很大，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價格。(訪談對象 S090803-15)

實際上而言，無論自營企業主或者是受雇台幹皆是被迫西進，因爲在台灣的經營條件愈來愈不利於他們時，若不跟著一起西進，都會面臨「關廠失業」。不管是資遣勞工的企業主，還是被資遣的台幹，當同時面臨此一景況時，都是殊途同歸。

西進大陸之後，對自營企業主而言，降低勞力成本並且打開市場商機，讓收益增加；對台幹來講，薪資也比在台灣高，讓他們的所得增加，加上當地的消費水準偏低，兩相加減下，讓台商的財富比原本在台時增加，也能過比在台灣時更好的生活（如下圖所示）。¹⁵

¹⁵ 雖然上海市的消費差距兩極化，還是可以取得不少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生鮮食材、四季食蔬。在田調過程中，令研究者最印象深刻的是在台灣原本高價的水蜜桃、葡萄、大閘蟹，在中國大陸都可以快速且便宜取得，尤其在盛產季，不少台商的家裡更是天天吃，還拿來做送人的伴手禮。



圖四 跨界流動後財富增加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最具代表性的是原先在台灣無法負擔請幫傭的薪資，但來中國大陸後，受惠於便宜的勞動市場，台商家家都有阿姨：

上海居，家家都有「國語嘛也通」的阿姨。已前在台灣——成天在「柴米油鹽中打轉」；到了上海後——變成了「一切阿姨包辦」。不知不覺，上海阿姨已成家中不可或缺的幫手，更是讓我看盡上海生活的一扇窗（金碧，2001：33）

雖然上海市消費水準飆升連台商自己也消費不起某些高檔商品，尤其是對於經理階級的受訪者而言感受深刻，不過若把高檔消費當成日常生活中的偶爾享受，還是足夠負擔。

貳、 長期處於居留身份，不考慮申請永久居留

本文的受訪者大都是只拿一年一簽的工作簽證，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每年去換簽證就好了，這並不是麻煩的手續，並沒有太大的需要去申請永久居留。除了已決定全家要留在中國大陸長期發展的受訪者，才會考慮去申請五年的工作簽證或

者是永久居留證。

在 2004 年中國大陸所頒布的永久居留權，也就是俗稱的中國綠卡，會有人考慮嗎？在上海待了十七年之久的 S090719-01，他的觀察是不會有台灣人想要拿，而且有了永久居留權，所有海外資產會被查稅：

[2004 年有中國綠卡，永久居留權的制度，有聽過有人想拿的嗎？] 中國綠卡沒有在實施的，台灣人沒有去拿。居留證五年一到去換就好，何必去拿綠卡。這是學美國的，只要一拿到綠卡，所有海外資產就要被查稅。(訪談對象 S090719-01)

來往兩岸已達二十年經驗的 S090721-04 對於身旁台商朋友的觀察也同 S090719-01，沒有人會想要拿，因為在上海市沒有安全感：

[永久居留權的制度，您身旁有人會想拿嗎？] 目前我接觸的台商，都沒有人去拿，因為現在這個社會還不是讓我們太放心，很多人買房子只是要升值 (訪談對象 S090721-04)

對於長期處於居留身份的台商而言，醫療體系才是台商社群生活在中國大陸最大的煩惱：

台灣會保團體險，我會幫我員工多保商業險，因為這裡的醫療水準不好。我現在都是去辰新醫院，去看個重感冒要 250 人民幣，要回去報台灣的補助手續會很麻煩 要給海基和海協都要蓋章，這裡醫療真是相當麻煩，聽說台灣的補助可以到全額。(訪談對象 S090721-04)

而在醫療體系不佳，欠缺好的醫療服務，需要用更多的金錢取得。在聊到這議題時，一位受訪者的小孩在前幾天發燒送當地醫院，他心有所感的說到：

這邊是花錢買服務的，像我小朋友要看病，去這邊的醫院，人都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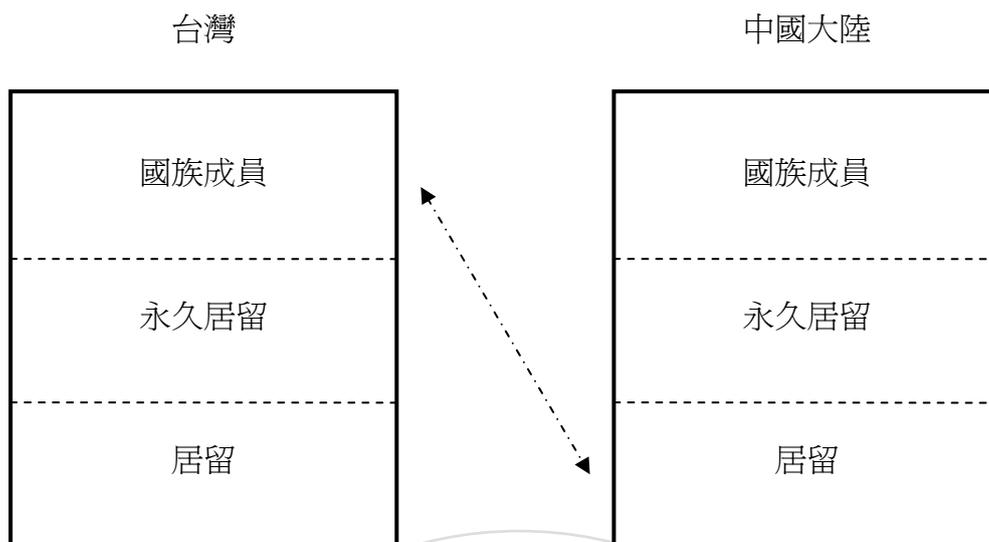
看病的話又排很長。這邊大陸又很吵，要拿藥也排很久，許多時間都耗在這邊，我前幾天跟一個當地朋友聊到這個，這也是他們頭痛的問題.....他們這邊的醫院只開兩個窗口，一個是特別門診，一個是普通門診。特別門診的收費很貴，可是不用等，很快而且服務態度也很好，不像普通窗口，他們錢都是丟的，臉又很臭。(訪談對象 S090731-06)

而一位已經在中國大陸有十七年經驗的受訪者，對於改善醫療待遇這部分，更是斬釘截鐵的說「不可能」：

[希望能改善哪些待遇？醫療方面的呢？] 不可能，因為他們絕對不會給，也不用反映了。沒有人去反映醫療保險，醫院這麼髒，大陸十三億人都沒反應了，怎麼可能理台商的反應！你又不是他們的公民，是拿居留權、工作證在這裡打工投資的。(訪談對象 S090719-01)

雖然曾熾芬(2008:17)提到中國大陸已開放不少專業領域的考照與自由就業、可繳保費參加社會保險的規定，意欲用準公民身份的方式(曾熾芬是採用「中介公民」一詞)整合台人進入中國大陸的成員身份體系，但這對於不符合此規定的台商來講，沒有辦法改善他們的狀況。在長期處於居留身份無法獲得有一定水準又不會太貴的醫療服務，他們就必須回到台灣使用健康保險體系或者是回台申請健保補助。

從以上所述可知，由於跨界流動產生成員身份的變動(參圖五)，兩岸都有台商社群需要的生存資源(台灣的社福資源和大陸的財富所得)，於是他們持續性地跨界流動，也形成一種宛若在生活機能上的跨界分工。



圖五 成員身份的跨界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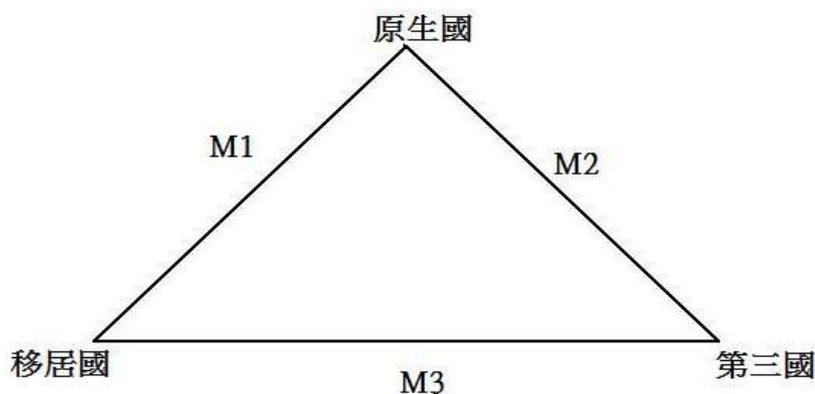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參、 跨界旅行證件的方便性考量

當問到台商在當地的身份選擇問題時，有些台商是從跨界旅行證件的方便性考量出發，而保持目前的台灣護照。

[前提是會不會影響到原本的國籍?]很多人都還是不願意換掉台灣的國籍，因為回台灣會被當大陸人士，而且大陸這邊要拿到其他國家的簽證是相對困難很多的。(訪談對象 S090720-03)

而跨界旅行證件的方便與否即是代表一種能不能順利穿透國家設下的種種跨界障礙的能力。由於一個國家對於該國公民的出入境限制，其他國家對於移民的簽證申請規定、出入境限制，都會影響到白領移民的跨界流動能力。因而白領移民擁有哪一國家的公民身份，將會影響白領移民在申請出境許可、他國簽證時的申請手續和所需的金錢、時間成本。本研究歸納出四種考量情境來呈現台商的理性思考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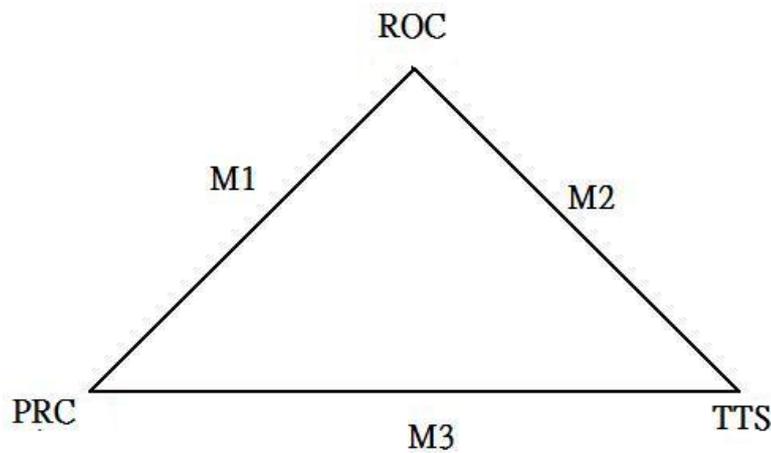


圖六、白領移民的跨國場域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圖六是表示白領移民的跨國社群所形成的跨國社會場域。由於白領移民的跨國行動，不會僅限於在原生國、移居國兩地之間的流動，也會移動到原生國與移居國以外的國家，所以白領移民跨國社群的跨國社會場域可以由原生國、移居國、第三國為頂點所連成的三角形簡化表示。

在圖示的跨國社會場域裡，跨國流動能力以 M (Mobility) 表示，不同國家間的跨國流動能力分別以代號 M1、M2、M3 表示，M1、M2、M3 線段的長度代表兩地之間的流動難易度。流動能力的限制愈少，所花的時間、金錢成本愈少，代表流動愈容易，移動距離最短，圖形上的兩地距離也會愈短。反之，若移民在流動過程中遭遇的阻礙愈多，如申請出入境手續的繁雜、不容易申請他國簽證，使移民愈不容易進行跨國流動，那兩地的距離也會愈遠。

以中國大陸的台商社群為例，他們的跨國社會場域可用圖七表示。原生國籍是中華民國 (以 ROC 簡稱)，移居國是中國大陸 (以 PRC 簡稱)，第三國則可能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或者是越南、新加坡等國，以 TTS (The Third State) 簡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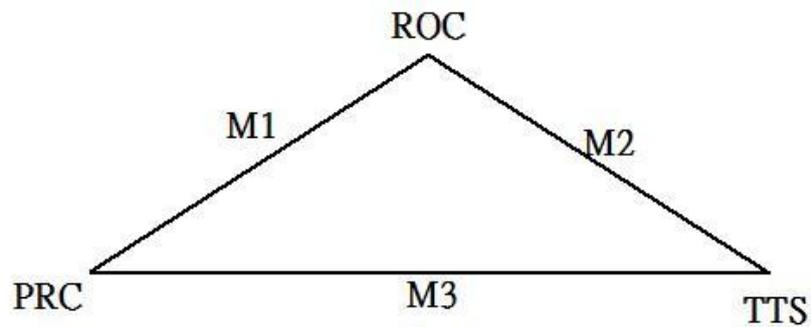


圖七、台商社群的跨國社會場域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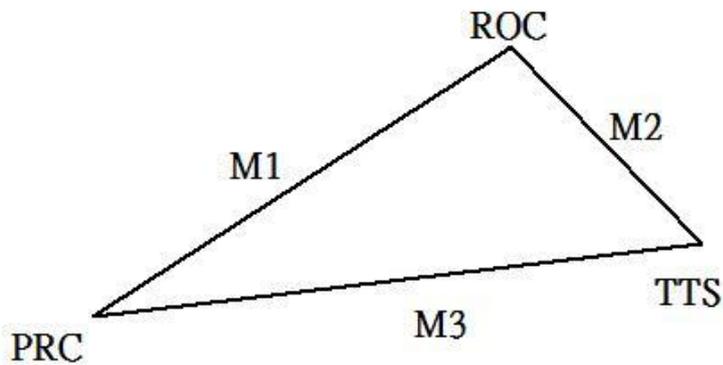
所以在跨界旅行證件如何穿透跨界障礙的方面，有四種考量情境，表示中國大陸台商在進行跨界行動時，所依據的個人利害考量。

情境一：台商只有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話，可以持台胞證進出中國大陸，也能夠向第三國申請簽證。在第三國沒有免簽證的入境優惠下，台商在辦理台胞證和申請第三國簽證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是相差不遠的，因此 M1 和 M2 的流動能力是一樣的。而台商居住在中國大陸要前往第三國時，也是可以用台胞證向第三國駐中國大陸的大使館辦理，但在中國大陸的簽證官審核還是會比在台灣的簽證官嚴格，這會降低 M3 的流動能力。可以用圖八表示。



圖八、情境一 M1=M2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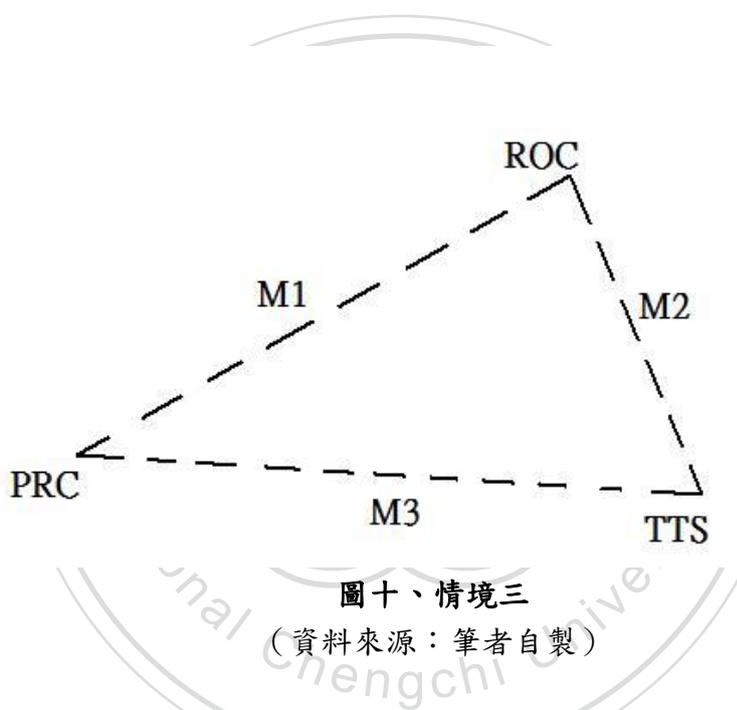
情境二：台商有雙重國籍，同時擁有中華民國護照和第三國的護照，台商在來往原生國跟第三國之間的流動能力會提高，M2 會縮短。台商可以選擇以台胞證或第三國護照進出中國大陸，而用台胞證進出中國大陸的流動能力比用第三國護照佳，M1 會比 M3 流動能力強。可用圖九表示。但是符合這種雙重／多重國籍條件的台商仍是少數，大多數的台商社群成員仍適用情境一的情況。



圖九、情境二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情境三：台商放棄中華民國護照，只有中國大陸的護照。台商以中國大陸居

民的身份回到台灣，會同時受到中國大陸跟台灣的法規限制，而且台商若要前往第三國，要面臨中國大陸內部嚴格的公民出入境歸定，需要向公安部門申請許可，並且需要擔保金，也不能回台灣辦理前往第三國的簽證。二來，第三國的簽證官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簽證申請審核是比台灣人身份嚴格很多。M1、M3 的流動能力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而 M2 的存在是存疑的，三邊皆以虛線表示。所以情境三的情況，只有拿中國大陸護照的台商是很難維持原有的跨國流動場域。如圖十所示。



情境四：這是假設狀況，如果在可以不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前提下，也可以獲得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和護照，對台商而言，其實對跨國流動能力沒有任何助益，與情境一的流動情形相同。不過擁有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對於長期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台商社群是比較有利於在中國大陸生活，能夠享有中國大陸的國民待遇，但並非全部的台商社群都需要中國大陸的國民待遇，所以當這種假設狀況出現的話，也並不一定會成為台商的必要選項。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在第一節先從研究問題「假設可以保留台灣護照，願意或不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身份證」的願意與不願意兩類回應的分類，從有代表性的訪談個案的故事敘述著手，描述他們考慮身份選擇的歷程。本研究發現兩點需要更深討論的，第一為不管是願意或者不願意考慮，他們都很清楚堅持己身的台灣人身份，台灣人身份的認同並非影響他們是否願意考慮選擇中國大陸身份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台人的身分在他們思考邏輯中似乎轉變成地域、出生地根源，在考量是否願意拿中國大陸的公民身分時，是傾向於「有沒有用處」的工具理性邏輯（如跨界的方便性、社會福利的享用），減少了國族意涵的對抗。不過研究者觀察到許多受訪者（如林安、慧姐跟高大哥、洪大哥、虞太太）仍會在意談論此議題的政治敏感性，在被問及時全部轉用台語交談，他們仍希望避免受訪地點附近的當地人或者是公司的陸幹聽到。第二點是兩種不同考量的受訪者，卻不約而同地都鼓勵自己的子女要融入當地，跟當地人建立關係，並沒有表示反對子女選擇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台商對子女的身份選擇的考量成了一組對照組，能夠比較出台商對於中國大陸身份選擇的思考邏輯更多層次的剖析。

在第二節從較宏觀的角度說明上海市台商的流動現況。受訪的上海市台商透過登陸西進解決的原本在台灣生存危機，滿足了其生存、物質享受的需求，但他們以「暫時居留」的身份久居中國大陸，無法使用移居國的社會福利體系與其他國民待遇。中國大陸未完善的公共衛生、醫療照護體系無法滿足台商社群的健康需要。所以他們必須要回到台灣使用相關資源，形成了一種生活機能／需求滿足的跨界分工。

本研究將於下一章從不同流動能力的指標，來討論這種跨界分工行為的產生與持續性原因。

第四章 大鵬逍遙遊？受訪案例的流動能力分析

本章主要是說明本研究對於上海市受訪台商流動能力分析。首先在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所受訪的上海市台商多具有優勢的經濟能力和個人資源以穿透跨界障礙，並維持持續性的流動。第二節則是討論經濟謀生以及返鄉情感推動了跨國網絡的形成與持續性。第三節是說明台商認同中的全球觀轉變，使得台商的流動方向與目的地漸漸地從歐美各國轉向到中國大陸。第四節則是提出初步的類型建構，說明不同類型台商的流動路徑選擇。

第一節 個人能力是能否穿透跨界障礙的因素

雖然「人員流動能力」(human mobility)強調個人、家庭或團體的「選擇能力」。但是遷移者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不僅決定了流動能力的強弱，同時若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缺乏，也形成自由流動的障礙。事實上，要從事看似便利、快捷的跨國流動，並且能夠持續性的流動，是必須花費頗多的時間與金錢成本。若先不考慮申請簽證等跨界的行政手續和費用，光是來回機票的費用，對於某些人來說就會是經濟上的負擔。¹⁶

¹⁶ 以台幣的機票價格來看，先比價國際航線最便宜的來回機票，前往東北亞、東南亞機票至少也要 7,000 元上下（如飛東京、曼谷、馬尼拉），最多約 15,000 元（飛巴厘島）；美加地區最少是飛舊金山的 23,000 元，最多是前往紐約的 32,000 元；要到歐洲的話至少也得準備 28,000 元。然後台北—上海的最便宜來回機票來說，在一般時日，最便宜的是要轉機的機票，到上海要 7679 元，直航的話依據艙等和促銷條件的不同，至少也得要 8500-12000 不等。到了特殊節日，機票價格也會水漲船高，尤其是每年的春節，不僅價格高，更是一位難求。而自從 2008 年年底開始截彎取直的兩岸直航包機後，已經連續兩年，春節機票票價都會爆增。2009 年的票價飆到台幣三萬兩千元（七千多人民幣），都相當於可以飛歐洲跟美加的機票價格，2010 年的票價也很難降下來。如果是一家四口要回台過年，就算是最便宜的轉機機票，也得負擔將近十萬元台幣。關於國際和兩岸的機票價格，本文資訊是參考下列兩個網站：國際機票比價_FunTime 旅遊搜尋，網址：<http://www.funtime.com.tw/oveticket/>。易遊網 - 國際機票專賣，網址：http://www.eztravel.com.tw/airticket/fit/index.htm?gclid=CKjb5OuSkJ8CFYYwpAodPVOTbQ&WT.mc_t=ADWORD。

壹、 要進行持續性的流動需要經濟優勢的支撐

若是要能自由選擇何時能流動、能一次負擔多個家庭成員的機票費用，就需要有相當的經濟能力自行負擔（或至少是所工作企業提供部分補助），才不用焦慮發愁如何去籌錢買機票。以直航票價為例，對於台商而言，雖然會覺得直航票價貴，但仍可以負擔家庭成員的機票費用，而不會造成家庭經濟的危機。有受訪者的想法是與其回台灣，還不如花這些機票錢到國外旅遊聖地度假。

不過對於部分受訪者來說，由於他們工廠規模較小，考量到人事成本的節省，都是老闆夫妻倆親自管工廠，其他廠內職員都是請陸幹，常需要有人盯著工廠的運作，這也使他們無法自由回台灣，但在「特別有事」或者是「放長假」的時候也是能自由選擇何時能流動：

我一年回去一到二次，儘量放在過年這個時候，接下來要回去的話，就是五一、十一，這邊放長假的時候，因為我工廠這邊平常上班的話不能沒有人在管，只能挑大家都放長假休息的時候回台灣。（訪談對象 S090804-20）

貳、 職位及專業能力使台商社群擁有經濟優勢

台商社群的經濟優勢，主要來自他們在中國大陸所從事的行業、所擔任的職位及擁有的專業能力，上述三個因素都反映在他們的薪資結構上。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台商的薪資結構。

對於大部分台資企業來講，派駐大陸企業台幹的報酬往往是參照臺灣企業的報酬體系來制定的（劉玉照、王平、應可為，2008）。劉玉照、王平、應可為引述黃同圳在 1995 年的研究，說明台資企業對台幹的薪資安排有四種：一是按照臺灣薪資加成給付，約 1.5 倍到 6 倍之間；二是臺灣薪資另加各種不同名目的津

貼；三是臺灣薪資加大陸薪資；四是根據時間長短來確定。另外，還不同程度地負責派遣人員的食、住、行、醫療、賦稅，攜眷成本或往返休假的機票等。

後來，隨著兩岸收入差距的縮小和成本的壓力，台幹與陸幹收入的差距也不斷縮小，但在絕大部分企業中仍堅持台幹跟陸幹的薪資差距。按照最近幾年的調查，台幹的薪酬基本上是臺灣薪資的 1.2-1.5 倍，外加住宿、生活補貼和探親機票，總收入大約為同級別陸幹收入的 4-5 倍，普通工人工資的 10 倍（劉玉照、王平、應可為，2008）。

能夠領這麼高的薪水，相對的也得付出相當的表現和專業能力。先以人數最多的製造業而言，由於產品的製作過程多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術，這代表管理與經營工廠的老闆和幹部們也需要相關的專業能力才能勝任之。尤其對於受僱到中國大陸管理工廠的經理階級而言，更是需要一肩擔起工廠的運作與達成老闆的目標。一位擔任副總經理的受訪者 S090731-09，他的老闆，也就是工廠的總經理幾乎都在台灣，S090731-09 是幾乎一肩扛起在上海市的工廠管理：

我的廠的原料有 90%都是要在這邊採購的，我的廠算是小的，不到一百個人，這個廠的財務是我掌握的，我的想法跟大廠不同，我覺得小廠比較好掌握，越小的越好掌握。工廠的採購、單價都是我在談的，所以百分之百一定要接觸當地人。（訪談對象 S090731-09）

但尤其是製造業的台商，因為「他們[大陸人]會學，然後自己出來開公司」的因素，也逐漸面臨專業能力的失去優勢：

之前我在東莞是賣方市場，因為那個時候都沒有人在做這行，國營企業的質量也不好，他們是抱著人民幣來求的，可是最近幾年，競爭對手一個個出來了，生意就難做了。（訪談對象 S090731-06）

不過，有的台商還是充滿信心，因為當地人就算也會做類似的產品，但是生

產品質仍舊有蠻大的落差，因此他們對於自己的專業能力優勢是表現在對生產品質的要求上，來維持企業的生產和獲利優勢：

台灣人在這邊要做最高等級的，做一般的拚不過那些阿六仔的。這邊陸資敢開 6% 的稅，他們的成本壓低很多，我只能想辦法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優先，讓我和陸資的價格不要差太多。我跟這邊的廠商談合作，品質絕對是第一的考量，都會請他們先送樣品過來，如果品質不好，那就不用談的。(訪談對象 S090731-09)

對中國大陸台商而言，他們的經濟優勢確實使他們能有高度的流動能力，這是讓台商能持續性的跨界，與維持兩地社會的連結的重要原因之一(耿曙，2008；鄧建邦，2009)。但經濟優勢的背後仍然需要中國大陸所欠缺的生產技術，或者是極強的經營管理能力做後盾，才夠格享有這種高薪資報酬。

第二節 跨國網絡的形成與持續性

大多數的台商跨國網絡都是始於經濟網絡的擴展，之後開始出現台商舉家遷移的情形，形成跨國社會網絡。本文分別從跨國經濟網絡以及跨國社會網絡兩大部分來說明跨國網絡的形成與持續的原因：經濟謀生與返鄉情感。

壹、 經濟謀生考量與跨國經濟網絡的擴張

一、 被迫擴張的跨國經濟網絡

龔宜君(2008：129)以「生成於亞洲的新興跨國資本」為題來形容台商的跨界投資、生產的行動。後進的台灣企業在 1980 年代以後為了要因應國外客戶降低成本的壓力，以及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新台幣的升值，不得不到海外投資，這使得台灣企業跨界投資(或全球化)的軌跡從單一生產基地走向多邊生產。龔

宜君在文中主要以台商在台灣、東南亞、中國大陸的三邊生產模式為研究案例(龔宜君, 2008: 131), 而事實上, 有些台商企業已經轉變成頗具規模的跨國企業, 他們的經營生產觸角已經不限於此三邊模式。龔文另外強調做為跨國資本的台灣資本是一種說華語的跨國資本, 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 的網絡關係也受到台灣資本的使用, 同時台灣資本也建構了一個包括台灣人在內的華人經濟網絡。龔文是這麼描述台商—華人經濟網絡的興起過程:

這個新的華人網絡, 基本上是以台灣製造業的跨國資本為核心, 動員亞洲各地的華人經濟精英。台商除了在投資地方與華人建立合作與雇佣關係外, 也隨著台灣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或區域化的分工佈局, 而動員當地華人到全球或區域不同的國家去……隨著台灣資本全球化以及區域化程度的深化, 這樣的海外華人動員也愈來愈普遍, 一種新型態有別於東南亞華人以貿易網絡為核心的台商—華人經濟網絡的正在興起中(龔宜君, 2008: 135)。

龔宜君的研究指出了後進的台灣企業皆是被迫從台灣島內外移才成為跨國公司, 而台灣的協力生產網絡特性也讓大廠的協力廠也被迫外移。如前述第三章所提到的從事製造業的受訪者(慧姐跟高大哥、家君跟弘鑫、張爸爸、洪大哥、虞太太)都是由於此全球生產鏈的大變動才開始跨界流動的生活, 而為了要能夠兼顧家庭, 使得他們的子女(像是小張、隆興)也跟著父母遷移至上海市就學。

二、 家庭／家族分散風險的考量

從第二章所提到的「新移民經濟學」和「移民社會網絡」理論, 能夠理解跨國網絡的形成可以始於移民原生國的家庭／家族分散風險的考量而啟動, 並且藉著與國外既存的移民社會網絡之連結進一步強化, 同時也融為移民社會網絡的一部份。而跨國移民也會考量到以後世界局勢的變動, 為將來的經濟謀生機會鋪路, 而安排自己的子女或家人前往其他國家生活、學習當地語言、建立當地關係。

身在中國大陸的台商與其他國外白領移民或多或少都有這種考量：

原來，我不了解為什麼在上海中學國際部有那麼多美籍、日籍、韓籍和其他國籍的學生，為什麼捨美國學校、日僑學校不唸跑來和中國人混在一起？難道是為了節省一年五千美元的學費？[上海中學學費年約一萬元，美國學校一萬五千元，此為 2000 年左右資料，現遠不止於此]當我把此疑惑向金髮碧眼的美國律師和韓國太太請教後，才明白他們做此安排的真正用意。共同說法是，中文在美、韓絕對是外來語，只要小孩懂中文，回國後不怕找不到職業，不怕沒有跨國企業的班可上，不會餓死，是他們送小孩上中文學校的真正原因。其中，韓國籍的李太太的解釋更讓我印象深刻，她的大兒子在澳洲、女兒在瑞士，她把小兒子送到上海，是根據韓國可能的變局和整個世界局勢發展預測的決定（陳彬，2001：105-106）。

這種家庭／家族分散風險的考量也出現在第三章所列的九組受訪者對子女的生涯安排思考中，對這九組的親代受訪者而言，融入當地的考量皆是指讓子女能夠融入當地，透過在當地學校就讀，發展五同關係的方式。本研究認為此現象為華人文化重視「關係網絡（guanxi network）」的傳統所致。由於身為父母的台商們在移居上海市前已經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能力和人脈資源，但隨他們前去上海的子女，一方面羽翼未豐，還未培養好專業能力，仍需仰賴家中的資源，而子女的大陸學歷也未能受到台灣政府的承認，不便返台求職謀生；二方面，由於現今中國大陸各層面的領域仍非常重視人際關係勝於專業能力的重視，因此若想要好好掌握中國大陸的發展機會，就需要善加經營當地的人際關係以利於工作資歷空白、專業能力未成熟的台商子女將來的謀職，或者繼承往後家族事業的經營。基於上述兩個考量，父母輩的台商對於子女將來選擇何種成員身份或公民身份的決定，給予較大的彈性空間，尤其當選擇特定的成員身份或公民身份能夠增加未來子女謀生的優勢時。

貳、 跨國社會網絡與返鄉情感

從上海市台商社群的經驗來看，當台商跨國資本的運作逐漸成熟，也伴隨著愈來愈開放的疆界與多樣化的交通方式，台商的跨國行為不再只是單身赴大陸的分居家庭模式，愈來愈多的台商舉家遷移到中國大陸，讓孩子接受當地的教育，計畫讓孩子將來留在大陸發展，或者是以中國大陸做跳板到其他國家發展。因而龔文所描述的台商——華人經濟網絡，已經快速轉變成為持續不斷增長的跨國社會場域，對於台商的研究不能只侷限在個人經濟資本的投資者角度，需要從台商跨國社群的跨國移民方向去理解。

一、 家庭／家族跨國網絡的建立

在多國的跨國網絡中，最典型為橫跨數國的家族網絡：

我的太太和小孩都沒有跟著過來，我的小兒子有被公司派過來過，可是久待後他還是不太習慣，就回去台灣了。我的兩個女婿，一個是韓國的，一個是日本的。因為一個小孩是念日語的，一開始是接觸日商，進去日商公司認識現在的老公。另一個是去英國留學認識的。（訪談對象 S090803-15）

另外一種則是像第三章所描述的林安、王晰、家君跟弘鑫的例子，他們本身就擁有豐富的、長時期的跨國經驗，建立起自身的多國跨國網絡。

擁有多國跨國網絡，也讓白領移民能有前往不同地區發展的選項。就像慧姐、高大哥表示若在中國大陸待不下去，他們會考慮前往有親戚經營過事業的越南。

而沒有多國跨國網絡的受訪者，他們的父母、親戚、朋友都仍在台灣，這讓他們保持至少在重要節日或有特殊事故發生時，都會返台拜年或關心親友的狀況。

二、 返鄉情感的聯繫

對於本研究受訪者而言，維繫跨國網絡的原因除了跨國企業經濟網絡的擴展、家庭／家族分散風險的考量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情感因素。前兩者皆為經濟因素，但傳統的經濟因素仍無法完全解釋所有的跨國人口流動現象，返鄉客對母國或原生家庭的情感因素，有時能比傳統的經濟因素更能說明為什麼要回到原居地的原因（林平，2008：6）。

台灣對於旅居在外的台灣人是「家鄉」，尤其是對於在台灣擁有成長記憶的成年台商以及他們年紀比較大的子女而言這種感受更深。

雖然在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者用「過客」、「浮萍」、「異鄉人」、「魯賓遜」、「油麻菜籽」、「吉普賽人」等各種離散漂泊意喻的詞彙形容自身的處境：

哪邊像家？我覺得兩邊都有，我們就像是魯賓遜一樣。（訪談對象 S090806-30）

我覺得自己是無根的浮萍，就像油麻菜籽一樣，哪裡落下，哪裡生根。……可是台灣是我生長三十年的地方，小時候的記憶，求學的記憶，妳想長大後不管去哪裡，一定是最懷念外婆的紅燒麵！（訪談對象 S090730-05）

其實我們到過很多地方，老大是在馬來西亞的時候生的，老二是在這邊開廠的時候生的，兩個差七歲。……台灣還是有家的感覺，這邊的話我們只是過客，就是異鄉。（訪談對象 S090804-23）

不過當問及「您覺得台灣還是大陸比較像您的家（有「家」或「根」的感覺）？」，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回答是「台灣」，那是「家鄉」、「根」。

還是台灣有家的感覺，還沒有想到退休的事情，現在是會希望留在這邊發展，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在台灣，我回台灣就是回到家鄉，這也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成家，對這邊還沒有家的感覺。（訪談對象 S090814-36）

因為現在全家都在這邊發展，兩邊都有家的感覺，不過台灣畢竟是根，那邊比這邊更有家鄉的感覺。（訪談對象 S090802-11）

而基於返鄉情感的因素，多數的受訪者都還是會每年固定時節回家探訪親友，而其中有些受訪者表示計畫在退休後要返回台灣居住。

第三節 變動中的全球觀

就如第二章提到新馬學者對於跨國遷移的觀點，顯示移民的流動能力其實隱含著「方向性」考量，而流動的方向考量又受到了核心跟邊陲的全球觀之牽引，筆者將於此小節以台商社群為主要的研究案例，先剖析台商的認同內容，進一步素描出構成部分「認同」的全球觀之面貌。

在作者的田調過程中，每當問及「願不願意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的問題時，大部分受訪者初次都會以「當然不會考慮拿」、「我是台灣人，沒有必要拿」類似的理由，理所當然地回應，而其中極少數受訪者會明示或暗示「這是政治性議題」、「這滿敏感的」來迴避這個問題。因而乍聽之下，上海市台商社群的公民身份的選擇考量似乎與「台灣人認同」是息息相關，跟「流動能力」的考量連不上任何關係。但是當筆者次之間及假設性的問題「假設不用放棄台灣的護照，同時

也能夠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時，願不願意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就出現了「願意考慮」的聲音，理由如前第三章所述，可歸類成三種，第一種是已決意未來就是要在大陸長期深耕發展；第二種是看時勢的走向來考量要不要拿，第三種是將來不一定會留在大陸，只是單純想要擁有中國大陸的國民待遇，方便在此久居的生活。這就表示「台灣人認同」又似乎不是這麼首要的拒絕理由。

要更深入解釋上述看似矛盾的現象，本研究認為需要從在「台灣人認同」中隱隱若現的「全球觀」加以解答。就如 Lenski (1984: 36) 所提示的研究方向，不要只依個人或團體的陳述，而是要看其行為來推斷或歸納。Lenski 提出兩個理由，第一為個人和團體常掩飾真正的利益而不說，第二為從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知道潛意識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但是當事者往往不自知。本研究認為對於「公民身份的選擇考量」的研究不能只從受訪者所稱的「我是台灣人，沒有必要拿」就推斷是「台灣人認同」影響選擇考量，而是要從受訪者的思惟與行為切入研究。

而台商認同成分中的「全球觀」是筆者認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可能解答。如第二章所說明之「全球觀」的外部與內部的因素的交互影響會形塑移民的流動方向與心理評價，一開始本文將先結合汪宏倫對台灣的國族問題觀點與龔宜君對台商認同的看法，在下文說明本研究對於台商社群的認同形塑的想法：台灣曖昧不明的國格，如同一座漂浪流離的島嶼，使台商社群無法在國際制度上找到定位點，只能透過在國際經濟體系的地位與資本流動方向的追尋來謀求一個歸屬的所在。接著，將從台人認同中萃取出「全球觀」的要素，深入說明之。

壹、 台商社群的認同形塑與內涵：經濟發展榮耀與文化素質

汪宏倫 (2008: 73-91) 從組織的制度同形論著手，說明台灣曖昧不明的國家定位與國族問題是國際社會民族國家制度同形化導引出的需求，許多國族的爭

議，其實是制度運作上的問題。而 1990 年代以後，這些問題隨著台灣涉入全球化過程的加深而愈加惡化。很重要的原因為當全球社會的運作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的組成單位，但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中被剝奪的參與權，連帶也使得國族與公民身份在國際社會中隱然無蹤（汪宏倫，2009：79）。

台灣由於缺乏一個被承認的國家位格（statehood），連帶使得其國族屬性或地位（nationhood）被抹煞，也讓公民身份與國籍產生問題，個人無法成為一個可以被定義的行為者。

雖然台灣地位不被國際承認，但台灣人還是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遊走世界各地，而旅外的台灣人最能夠感受到這種尷尬又矛盾的處境，以及所產生的複雜感受。這種台灣的曖昧國格與被排除在國際組織的處境，除了凝聚了共同體的意識外，也導致普遍瀰漫的怨恨心態。汪宏倫（2009：85）認為怨恨心態首先是缺乏被國際承認，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國家，隨後台灣由於經貿實力的大為提升，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由邊陲向上流動到半邊陲，但此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擁有如此傲人成就的台灣卻仍無法改變之前的困境而進一步加深怨恨心態。

上述的原因造成了台灣在面對全球化時，卻有一種別處難以見到的無所適從、不知所終的焦慮與惶恐（汪宏倫，2009：87）。公民身份缺乏國際上的正式承認，也影響到在國際上到處奔走尋找商機的台商處境與感受，譬如說早年常見到的說法，台商在國外像孤兒一樣，台灣政府根本幫不了什麼忙。當認同缺乏了正當的國族身份為國際認可的外在象徵，於是台灣商人的國族認同很大部分就轉向以經濟成就為重要的認同內容。

龔宜君（2009：141）從人群認同的基礎討論台商的認同內容，她指出國族所擁有的人類成就是人群認同的基礎之一，而資本主義的制度更是台商所賴以為

生的，於是「經濟成就」會成為台商的重要認同基礎。她對東南亞台商的觀察：「經濟表現或成就，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成為台商自我認同與分類它者的重要依據，強調進步、向上、向前的史觀，重視技術和生產力的多寡與優劣」。這種經濟成就的認同也出現在中國大陸台商的思惟中：

像我小時候，那個時候台灣是四小龍啊，經濟成就那麼好，讓我感到很驕傲。……我們這邊台灣人是五開頭的到六出頭的之間，可是六以後的台灣人，我就知道了。我們都會要求自己做完工作，責任、榮譽感很強，這邊都會先問工作要求怎樣、薪水怎樣，不會想到另外的東西。(訪談對象 S090804-20)

更進一步說，「經濟奇蹟」是台灣主流媒體所稱頌的榮耀和傲人成就，在國際政治的失落與不滿，無法以受到國際承認的國族身份作為認同基礎，台商遂轉而朝向經濟成就的榮耀尋求慰藉。這可從我的訪談資料中得到佐證，當問到「對於台灣政府的決策，您認為『發展經濟』還是『追求尊嚴』比較重要？」許多的受訪者都將「尊嚴」跟「經濟」幾乎畫上等號：

尊嚴，沒有經濟，妳說什麼尊嚴，我是在商言商，有了錢就有尊嚴。(訪談對象 S090731-09)

你維護尊嚴，但你經濟不拉上來可以嗎？我們活在世界上都要現實一點，像很多問題只要經濟解決了，很多問題就解決了。(訪談對象 S090819-38)

不過本研究認為龔宜君的觀點仍顯狹隘，她過於強調經濟成就面向，卻忽略了資本主義邏輯中另一種「發展—文明」的評價。「發展—文明」的討論起於 Elias 的成名著作《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他在序文提到：

在社會長期朝著某一方向所發生的總體變化中，描寫這種變化的專業術語是「發展」，人的行為和經驗，由外部的強制和自我強制來控制的個人情感以及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所有行為的構成也會朝著某個方向變

化。……在日常生活中對這種變化的解釋往往是：自己所處國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國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國家的人「野蠻」。(王佩英，袁志英譯，2009：1)

Elias 從西歐的各種「禮儀」、「禮貌」的演進，探討文明如何隨著西歐社會的進步和資本主義滋長茁壯而演進。由於西歐地區被視為世界體系的核心區域，因而所謂的「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便是以西歐社會發展歷程為藍圖的「現代化理論」加以分類、評價。所以若從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去評價、區別他者，是同時包含著「經濟」與「文明」的面向，但「經濟成就」與「道德價值與文化優劣」的評價標準是不能混為一談。對中國大陸台商而言，己身「文化素質」的優越性，不僅區別出台灣人跟大陸人的差異，同時也是重要的認同內容：

因為他們的文化素質比我們晚了二十年，我不能了解他們的想法。有到中國大陸其他地方旅遊，就覺得很誇張，她們不排隊，搶位置，有一次去玩看到最誇張的是，為了要插隊，是踏著別人走過去。……這邊真的沒有倫理道德，沒有羞恥心和禮義廉恥。台灣人很懂得羞恥，我們是很有倫理道德的。(訪談對象 S090805-28)

而近年來，當中國大陸台商原有的經濟優勢不如以往，「經濟成就」漸漸並不是主要的認同要素，「文化素質」卻仍是重要的認同基礎。就如同慧姐很清楚認知到自身的「財富」比不過上海市的有錢人，但在文化素質的評價上，她仍然看不起當地人：

不過說到金錢上，我們是差他們很多，這邊有錢的人非常有錢，也滿多的，可是素質上他們有比我們好、水平很高的也有人，那些都是十個中只有一個，我是從整體上來說。……這邊的人就是缺乏倫理道德，禮義廉恥。像我之前有一次開車經過附近的大路，看到旁邊的草叢有東西在動，我還以為是有狗在那邊，後來仔細一看，發現是一對男女公然在路旁邊做愛，而且旁邊有一家飯店，從飯店靠近那個方向的窗子都可以看到這個活春宮。這也不只有一次，那附近常常發生。(訪談對象 S090803-13)

貳、 台商認同中的全球觀變遷：美國夢到中國熱

本研究將在此說明受訪的台商全球觀中的經濟發展面向已逐漸變遷，傾向追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機會，不過仍然保有對自身文化素質的優越感與自傲，跟大陸人在文化程度的比較亦成爲最主要的區別台灣人與大陸人的差異。最後本研究將以圖表解釋台商認同變遷的路徑。

一、 經濟發展面向的變遷

前述所言的以西歐、北美爲核心的全球觀確實也內化到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的思維中：

我覺得願不願意當這邊的國民，並不是在生活水平的關係，而是整體國家的實力。台灣的護照還是比較好用，就像我們會想要美國的護照一樣。(訪談對象 S090805-27)

台灣於七零年代所遭遇的經濟與外交的危機，使得前進美國（世界體系的核心）成爲主要的向上流動。「美國夢」化爲當時知識份子朗朗上口的 slogan：「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而在 1990 年代以來，全球化已是相當顯著的現象與全世界討論的議題，也成爲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所關心的焦點。「全球化」、「國際化」的詞彙與討論大量出現在報章媒體與政治論述中，坊間也流行起相關書籍，包括「台灣走出去」、「如何培養國際視野」、「擴展國際觀」等大量出現的標語。一再重複鼓吹向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看齊的「國際視野」引導著絕大部分台灣人努力進取的方向，前往核心國家尋求向上流動的機會。

但當中國也漸漸藉由世界工廠的地位從以往的邊陲走向半邊陲，沿海的繁榮

區域甚至快速躍身成區域的重心。中國大陸欣欣向榮的前景，強大的經濟實力及成長潛力，吸引全球對中國的高度興趣，帶起了全球的「中國熱」(The China Dream)(齊思賢譯，2002)。在我此次的上海行，受訪者們都一致看好中國大陸的發展前景，如同易文所言：

PRC 是在各個方面都非常有機會，要看懂不懂做第一個吃到螃蟹的人。因為螃蟹有殼、有刺，吃的時候很辛苦，也有可能刺破手和嘴，可是只要能夠吃到裡面的肉，那是非常鮮美的。中國大陸的發展非常非常有前景，這邊的市場汰換很快，必須不斷的學習，去抓住市場。(訪談對象 S090814-36)

中國大陸的崛起與發展前景使得追隨經濟資本而居的台灣人之全球觀產生了改變，不再視中國大陸為邊陲、落後之地，而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與工作前景的夢土，也將會是未來世界體系的重心。對於本研究的田野場域上海市而言，二十一世紀初的上海熱可以視為此種全球觀改變的代表現象：

幾年前回台灣時，在車上聽到台北愛樂電台一個關於小孩教育的廣告，大意是小孩的教育要即早投資，否則將來無法與台灣本地乃至上海的小孩競爭。台北愛樂電台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中產階級電台，這個廣告的播出，大概也指出了千禧年前後、上海熱之後，台北中產階級的焦慮——上海已然成為台北的競爭者(李政亮，2009：210)。

二、 文化素質的鴻溝

就如前所述全球觀的評價與分類之兩大標準是「經濟發展」、「文明程度」。本研究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全球觀已因為中國大陸的高度經濟發展而開始改變，他們很明瞭中國大陸是將來經濟發展所在，需要儘早卡位，但是在文化素質方面，上海市就算已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核心，並且文化水準有逐漸提升，但邊陲／落後地區的形象仍舊鮮明：

我來的時候，明珠塔還在蓋，現在十年都不得了，像之前同事來的時候，公司前面都還是田。可是品格還是不好，這十年來都沒有進步(台語講)，他們是從這幾年，京奧之後才開始教道德。經過文革後，原本中華文化的尊師重道、孝順父母、兄友弟恭、敦親睦鄰，這些都沒有了，所以這些都是要自己教。(訪談對象 S090802-11)

一位跟著父母來上海市的台生，目前還在大學求學，他在中國大陸待了九年，也去過多個不同區域的省市生活過。他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文明程度」的差距有一番很中肯、鮮活的描述：

大陸是個很特別的地方，一般文明是前面進步，後面跟上，但大陸是前面進步，後面不動，然後就拖很長。你可以看到一個穿得很新潮的人，旁邊走個一個穿馬褂布鞋的人，光自己的文化時間段就差很大。我本地同學還有那種坐在沙發上看唱戲聽收音機的人，他們雖然有網路與電視，但仍有那種古老習慣，但他們也有像現代人的一面。……經濟發展與文化水準是完全不相干的事，經濟可以一直發展，但文化可以一直保持在那邊。……可以看到很先進的東西，看到很傳統的東西。(訪談對象 S090815-37)

本研究所受訪的上海市台商一方面肯定上海市和中國大陸的發展前景，但發展榮景仍然無法抹滅其在台商社群心中的邊陲／落後地區的形象。可是當對比於台灣的發展停滯與政治惡鬥，相形之下中國大陸的發展榮景又更加強烈：

現在的差距有好多了，如果說一開始只有 10%，那現在進步到有 30%、40%了，妳說這十年台灣落後了多少，這邊進步了多少，我們都會很氣。……我現在認同的還是台灣，雖然很生氣現在台灣的狀況，那是恨鐵不成鋼。像我小時候，那個時候台灣是四小龍啊，經濟成就那麼好，讓我感到很驕傲，妳看現在變成這樣，我真是恨鐵不成鋼。(訪談對象 S090804-20)

跟隨著資本進入中國大陸經營多年的台商社群親眼目睹它的成長與壯大，相較於已臻某種成熟而成長停滯階段的台灣，台商社群的心態頗為矛盾：爲了要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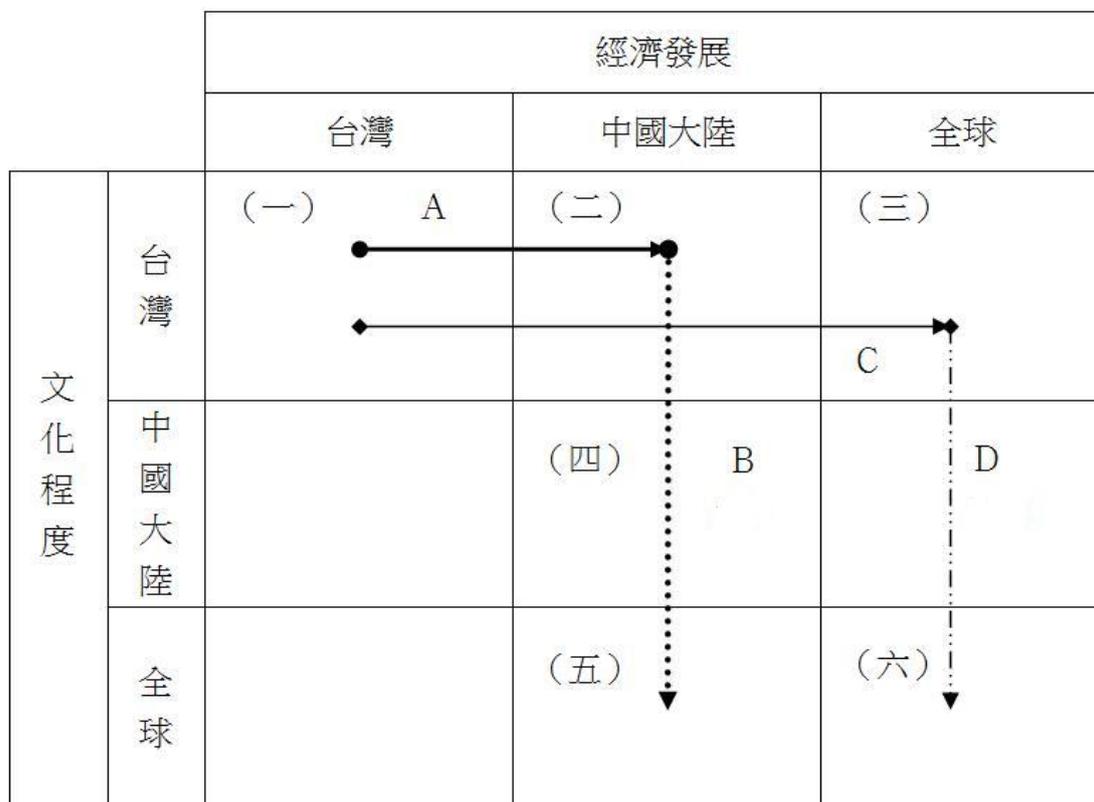
護台商企業在全球化生產鏈中半邊陲區位的優勢，並且向上提升，需要積極掌握中國大陸所呈現出的榮景與市場，長期深耕這塊未來在國際社會必然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土地，尤其在台灣的發展前景黯淡的同時，中國大陸是能做為長期發展以進入世界體系的跳板；但另一方面他們所接觸的大部分中國大陸人民未提升的素質，在在提醒了過往「中國大陸為邊陲落後之地」的深刻印象。¹⁷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在第二章文獻回顧的部分提到 Ong 的觀點認為全球資本的自由流動，影響了公民身份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跨國移民兩方面不同意義的轉變，但卻沒有詳細說明移民所根據的行動邏輯是如何被決定出來的。而移民研究中重視個人理性選擇的人力資本論以及強調結構強力制約移民遷移決定的新馬理論，雖然都在不同部分說明了移民行動邏輯的決定因素，但前者見林不見樹的盲點，輕忽了結構對移民理性抉擇的影響；後者則是有著見林不見樹的謬誤，疏漏了移民個人能夠克服結構，轉阻力為助力的能動性。本研究在此小節將結合上述三個觀點，嘗試對本研究的上海市台商的流動能力作不不同的分類。

¹⁷ 對於有些受訪者來說，上海市並不是久待之處，當問及台商之後的退休規劃，不少人仍希望回到台灣，不願意繼續留在上海市，其中除了返鄉、落葉歸根等原鄉情感外，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台灣的生活水準。由於中國大陸的邊陲／落後地區的形象仍舊鮮明，他們不認為這是個「好地方」，有受訪者直接用「往上爬」意喻著台灣的世界體系位階是高於上海市「會回去台灣，因為老了，要找生活機能好的地方，挑選適合生活的地方，人是要往上爬，養老的時候要挑選好的地方（訪談對象 S090731-06）。」

從第三章所描述的台商流動經驗，以及本章對於流動能力要素的分析，本研究認為由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所帶起的全球觀的變遷是四項流動能力評估指標中，對於上海市台商的身份選擇影響最大。以下本研究將全球觀的變遷分為五種變遷路徑加以說明（請參圖十一）：



圖十一 全球觀的變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區域（一）表示台商尚未被迫外移前，在經濟發展與文化程度上，都是以台灣為主的全球觀；區域（二）則表示經濟發展以中國大陸為主，文化程度以台灣為傲的全球觀；區域（三）是指經濟發展可從全球各地找尋機會，而文化程度仍以台灣為傲的全球觀；區域（四）則是指經濟發展與文化程度皆以中國大陸為主的全球觀；區域（五）為經濟發展重心在中國大陸，但是有開放心態，願意接納世界各地文化的全球觀；區域（六）則是最典型的全球菁英的全球觀，可以在全球各地找尋發展機會，並且也願意接納世界各地文化的全球觀。

而從上述六塊區域間的移動，本研究從圖十一所示的五種類型的全球觀變遷路徑，以分析受訪的上海市台商之流動經驗：

一、 路徑 A：從區域（一）移動到區域（二）。表示仍以台灣文化程度為傲，但在經濟發展上出現轉向中國大陸的變遷。而由於資本流動方向改變而被迫從台灣移往中國大陸發展的上海市台商大多數皆是從路徑 A 開始。而如第三章所提及的洪大哥、虞太太、易文、隆興，他們缺乏跨國網絡的資源，沒有尋求像其他國家發展的機會，所以皆希望能順應時勢，在中國大陸尋求生根發展機會，並且願意考慮取得中國大陸的身份證。另外台商對於子女的安排，希望子女能夠融入當地的想法，也是屬於此路徑的類型。

二、 路徑 A → 路徑 B：從區域（一）轉向到區域（五）。表示抓住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機會為跳板，逐漸將文化視野轉向願意接納世界各地文化的開放全球觀。本研究的受訪案例尚未有符合此變遷路徑。

三、 路徑 A → 路徑 C：從區域（一）過渡到區域（二）再轉向到區域（三）。表示以台灣文化為傲，但是經濟發展的觸角從中國大陸轉移到世界各地尋找機會的全球觀變遷。本研究認為，這種全球觀的變遷有兩種相反的發展，一種是台商藉由中國大陸的發展崛起，擴張成全球的跨國企業。但是另外一種發展，則是因為全球資本再度改變流動方向（如中國大陸基本工資上漲），使得台商離開中國大陸，前往其他國家尋求經濟發展，如同第三章所舉的慧姐跟高大哥想要以越南做為下一個轉移的經營地點。由於慧姐跟高大哥不會留戀在中國大陸尋找發展機會，也無意考慮是否要取得中國大陸的身份證。

四、 路徑 C：從區域（一）直接移動到區域（三）。表示台商是直接追求前往

世界各地的發展機會，而不是以中國大陸為最初的經濟發展跳板。本研究的受訪案例尚未有符合此變遷路徑。

五、 路徑 C → 路徑 D：從從區域（三）移動到區域（六）。這顯示台商轉變成典型的全球菁英全球觀的變遷路徑。本研究認為第三章所提到林安、王晰、家君跟弘鑫是最符合的例子，他們在前往上海市發展時，已經有過其他跨國工作的歷練，願意去開放、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並且也擁有穩定的多國跨國網絡，這讓他們不用只著重在一個地點尋求經濟發展，能夠將發展的觸角延伸到其他國家或區域。而林安、王晰本身所擁有的多重或雙重國籍，更可以幫助他們能更順利地進行跨國流動。因而林安、王晰、家君跟弘鑫也沒有需要去考慮是否要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

以上五種類型的變遷路徑，主要呈現以全球觀的變遷為主要影響因素，如何使流動能力能影響到受訪者身份選擇的考量，本研究將在最後一章將流動能力的四個評估指標結合起來，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第五章 結論：旅人世代的誕生及困境

作為一個卑微的旅人，我沒有能力詮釋我旅行過的世界，我只能觀察、記錄、理解，試圖參與。我也清楚的知道：無論我是否安全抵達我的目的地，我都已經回不去了。

—胡晴舫，《旅人》，2009

Bauman（張君玫譯，2001）指出在全球化社會中，我們一直都在移動，都在改變自己所在的位置，不論是真實的搬家、出外旅行，或者是在家透過網際網路接收各種不同的訊息，與世界各地的人交流，「移動（mobility）」已經變成最有力和最令人羨慕的階層化因素。我們透過移動的程度，每天重建或建立新的逐漸世界化的層級，以及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層級。

在全球化現象日漸深刻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已經無法不流動，各種的跨界流動成爲生活的常態，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生存方式。而現今持續且大量的跨國移民，皆不斷地在真實的跨界流動去親身經驗跨界生活中的變化，以及他們自身的認同與身份的掙扎。經歷著這個全球化現象的世代，由於都無法避免流動的共同經驗，我們都像是在地球村中的旅人，因此本研究用旅人世代來命名這總結的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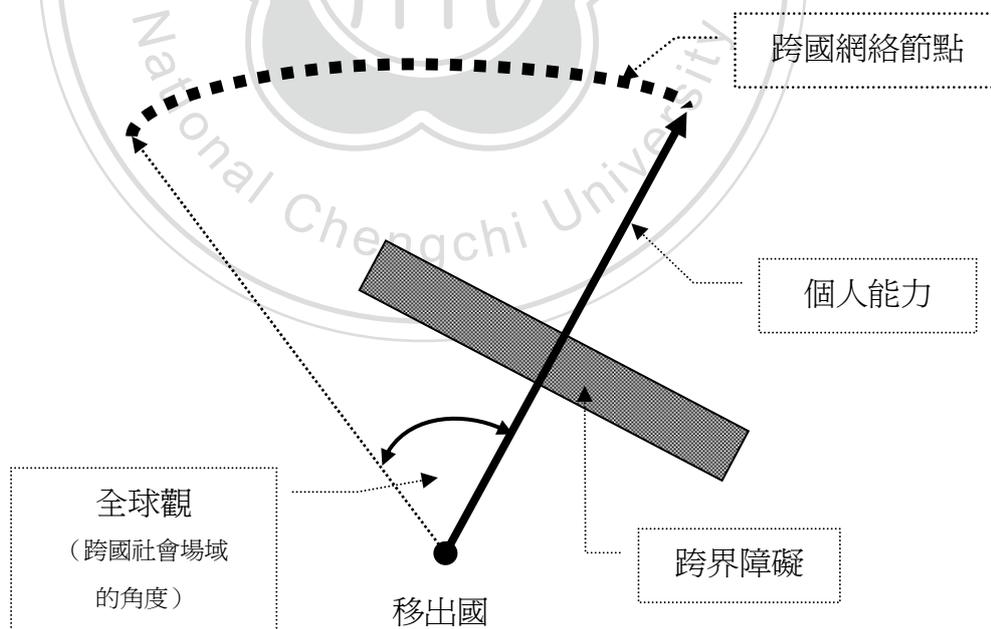
以下將在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歸納出的流動能力與身份選擇的關聯在於經營跨國社會領域的不同考量，並且會說明流動能力四項指標之間的模型關係。在第二節會說明本研究所遭遇的三項研究限制。最後一節則說明未來可以從本研究延伸出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流動能力與身份選擇的關聯：經營跨國社會場域的考量

「跨國社會場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概念，是指這種跨國場域是由不斷增長的、過著雙重生活的人組成：他們說著兩種語言，同時在兩個國家建立家園，通過經常性的跨國聯繫而謀生 (Basch, Schiller & Blanc, 1994: 27-30)。但此概念缺乏更深入的理論定義，也無法對全球化中快速流動的白領移民行動邏輯做出更具系統性的解釋，本研究嘗試利用流動能力的相關要素來更深入充實此一概念。

承接前述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討論，本研究認為跨國社會場域之所以能存在，必須要有能持續性的跨界流動能力，所以本研究嘗試由個人能力、跨界障礙、跨國網絡、全球觀四個要素來解釋跨國社會場域的形成與維繫 (參圖十二)。



圖十二 流動能力所形成的跨國社會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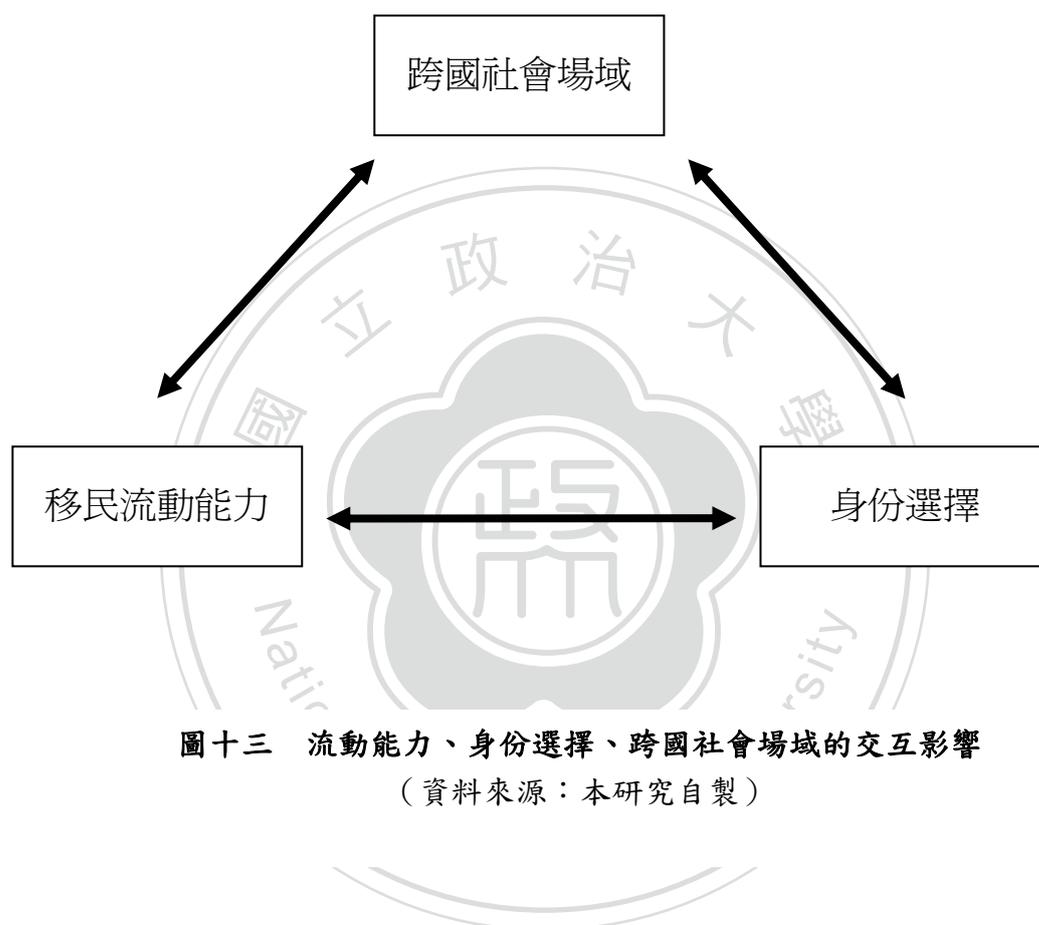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個人能力強弱顯示了跨國移民能夠移動到多遠的距離，這有兩方面的重要功能：穿透跨界障礙與維持流動的動能。當移民從移出國開始往外遷移時，首先必須要考慮如何去克服跨界障礙，而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強弱，就會先決定跨國遷移行動能否順利啓動。所以個人能力實際上是突破跨界障礙的主要動力，並且個人所能負擔的機票與住宿費用也決定了可以遷移到多遠的國家或區域旅遊，並且決定居住該地的時間長短。

跨國移民所擁有的「全球觀」標示出跨國移民的流動方向，代表著跨國社會場域的「廣度」（或「角度」），而跨國網絡的分佈，即表示跨國社會場域能夠延展的潛在節點。如同扇子的開闢一般，將移出國視為圓心，個人能力為扇骨，全球觀就顯示出扇子開闢的角度，而這個角度也決定了跨國社會領域的寬窄，換句話說，跨國移民的全球觀會限制住跨國移民所能利用的跨國網絡潛在節點數量。如果跨國移民擁有開闊的全球觀，樂於在不同的經濟發展與文明程度的國家間穿梭流動，同時跨國移民所參與的跨國網絡規模愈廣大，那他所能形成的跨國社會場域範圍也會是最廣的。反之，若跨國移民的全球觀僅限於經濟發展或文明程度，那他所能利用的跨國網絡節點也受到限制，將縮小了他所擁有的跨國社會場域的面積。

王愛華（Aiwa Ong）提出的華裔跨國行動邏輯是彈性利用不同的公民身份來獲取最佳的生存利益，本研究認為這種彈性公民身份的生存策略要運用得宜的話，跨國移民必須要先維繫住自身的跨國社會場域，才能夠在這個場域內安排與經營他們的跨國生活，以追求他們所認為的最佳生存利益。而換句話說，若跨國移民能善加利用不同的公民身份，也有助於擴大他們能經營的跨國社會場域的範圍。所以移民的流動能力、移民的身份選擇以及跨國社會場域的維繫這三者之間形成一種彼此連動、相輔相成的三角關係。

因此本研究認為原本前述的流動能力與身份選擇的研究架構在加入跨國社會場域的考量後，可被修正成以下的圖示：



圖十三 流動能力、身份選擇、跨國社會場域的交互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所以綜合圖十二、圖十三觀之，上海市台商的身份選擇考量，著重於選擇這個身份能否有助於去深化經營跨國社會場域。而從構成跨國社會領域的三個流動能力指標去觀察「在不放棄台灣護照的前提下，願意考慮拿中國大陸的身份證」的受訪者的選擇邏輯，都是爲了要強化其現有的跨國社會場域的經營。他們個人所擁有的資源較不足，也就是本身的職位以及薪資（又加上養家的負擔），使他們較缺乏經濟上的優勢，加上他們缺乏多國的跨國網絡，只限於兩岸往返，這使他們是傾向重在中國大陸找尋經濟發展機會的全球觀，希望能夠深入經營這個未

來的市場，這也是圖十一所示的路徑 A 全球觀之變遷。路徑 A 所形成的跨國社會領域也會是五種全球觀變遷路徑形成的跨國社會領域面積中最小的。

而從路徑 C→路徑 D 的全球觀變遷路徑，則是跨國社會場域最廣的，屬於此類型的上海市台商較多屬於自營企業主或者是高階台幹，有較強的經濟優勢，這之中的少數則擁有多重或雙重國籍，這些都使此類型的上海市台商擁有較強的個人能力。與此同時，他們也擁有多國的跨國網絡，能夠使他們能夠擁有能前往世界各地發展的機會以及人脈資源。屬於全球菁英類型的台商，他們不會太特意尋求特定的公民身份深化其跨國社會領域的經營。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可分為三個部份，茲在下文詳述之：

第一為研究資料蒐集上的限制。由於本研究在進入上海市田調前，原本是聚焦在吸引白領移民的移民政策上，但在實際展開移地研究，親身接觸台商之後，發現原本的研究構想與實際現況落差甚大，因而一邊在上海市進行田調的同時，也不斷地在具體化研究的問題和修正既有研究架構。最後本研究是從台商的跨疆界流動行為著手，一方面因台商的跨界流動行為目前甚少人關注，但這種跨界流動行為對於台商身份選擇的安排具有潛在重要影響，本研究嘗試去找出跨界流動與身份選擇之間的關係。但在前述修正研究架構的過程中，本研究在經驗資料的蒐集上產生了限制。因為隨著深度訪談問題的調整，所獲得的關於本研究問題的資料深淺不一。本研究就有限的研究資料試圖為這種跨界流動行為與身份選擇的關係做一個初步的理論建構，但是本研究的四項流動能力的指標均待更具體的數

據以強化其模型內涵。¹⁸

第二為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本研究採取滾雪球抽樣來挑選受訪者，所以所選的「線頭」即會影響到受訪者的抽樣是否會產生偏差的可能。而此次移地研究在田調的時間壓力以及人脈的限制上無法去顧及到篩選不同領域和產業「線頭」介紹受訪者以避免選樣偏差。因不同的產業特性亦會影響到受訪者的流動能力與身份選擇的考量，本研究的樣本過半是製造業，少數才是從事服務業及專業領域的受訪者，此讓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主要侷限在製造業的流動經驗。

第三是研究時間的限制。由於現在中國大陸台裔的跨國移民形態，仍然在演變當中，所以對於其身份選擇與生活安排也是形態不同，並且會隨著情境的轉變與移居時間的長短，上海市台裔對於身份安排的考量亦會有所變遷。但是此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得到更明顯的研究成果。

第三節 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本研究的基礎上，未來可以延伸的研究方向有四項：

第一為上海市台裔社群所面臨的跨國困境。本研究在田調過程中，聽到不少受訪者吐露他們位在兩岸夾縫，受到中國大陸與台灣兩邊社會的雙重標準對待。中國大陸將台灣人納為「中國國民」，卻常表露出「你是外國人」的態度。台灣的社會觀感一方面希望台裔回流，但又加以表露出不滿與遷怒的心態，並對他們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小孩，常用「大陸人」、「大陸妹」來嘲諷。這種不盡公平的雙重標準對待，是受訪台裔常常提及的跨界感受，也形成一種心理上的推力使他

¹⁸ 譬如：需要更深入了解受訪者的薪資所得數據、所屬產業特性與轉型、返台次數、親族網絡分佈狀況以及長期觀察其全球觀變遷軌跡的等等。

們維繫持續性的兩岸流動生活。台商社群的跨國經驗使他們成爲一群特殊的台灣人，他們所面臨的跨國困境亦將會對其認同造成影響，此將是台灣社會與政府需要重視的議題，以消除歧視，良性維繫與此台灣人群體的關係。

第二爲全球化的淘汰效應。Bauman（張君玫譯，2001：114-123）用觀光客和盲流兩種對照的象徵，憂慮地指出旅人世代所面臨的困境。¹⁹ 旅人雖乘著全球化的潮流前往各地，但這潮流也能無情地翻覆旅人所搭乘的船隻，在全球化效應產生的自然淘汰下，會產生「強制在地化」的效果，被淘汰的旅者失去了流動能力而被迫在地化。回到本研究對於上海市台商的田野調查，2008年金融風暴的席捲，讓部份被迫關廠的台商或者是失去工作的台幹成爲了頓失經濟優勢的「台流」，他們或許可以得到當地台灣同胞的幫助，籌得機票錢回台，但有部份則留在當地尋找東山再起的機會。

必須留意的，在跨國移民失去了從經營跨國社會場域以獲取生活資源的能力後，移居地的公民身份或成員身份就可能成爲重要的生存考量。而當跨國移民理性考量後需要選擇移居國公民身份或成員身份時，本研究所依據的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理論所提及的種種移民的權利問題往往也將會是他們所關心的權利爭取焦點。

第三，因爲移民現象可被視爲全球化現象的具體展現，前述第一與第二的研究方向皆可做爲深化現有全球化與在地化交互影響的研究，有助於更深入了解其交互影響的機制以做爲日後處理全球化與在地化議題的政策建議。

第四個研究方向則是可以提供「工具理性」與「文化信念」兩種價值拉扯的

¹⁹ Bauman（張君玫譯，2001：114-123）對於觀光客與盲流的區分：觀光客跟盲流的差別在於「選擇的自由」有無：觀光客可以去他們想要的地方；盲流只能身不由己地被迫行動。但另一方面，觀光客跟盲流之間的界線卻相當模糊，「在旅行的社會中，觀光客與盲流只是一體的兩面」。

具體案例研究。²⁰ 全球化現象產生了多重認同的現象，而多重認同的來源之一即是經濟資本（工具理性）與國家／地域認同（文化信念）的競逐，使得公民身份一方面工具化，但又無法免於國族象徵的紛擾。而上海市的台商群體就是處於這兩種價值拉扯的板塊交界上，能藉由對他們的身份選擇考量變遷的觀察，對此研究方向提供更豐富的研究資料。



²⁰ 在此感謝台大政治系徐思勤老師在 2010 年「中國研究暨蹲點」研究生研習營對本研究報告的建議，提供此項未來可著力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工商時報》，2009，〈溫家寶拍板 加速建設上海成國際金融中心〉，3月26日，A8版。
- 《中國時報》，2009，〈上海致力推動航運服務中心〉，A9版，4月6日。
- 王佩英，袁志英譯，2009，《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譯自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Es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 石之瑜，1995，《後現代的國家認同》，臺北：世界書局。
- 吳前進，2007，〈跨國主義的移民研究—歐美學者的觀點和貢獻〉，《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4期，頁64-72。
- 汪宏倫，2008，〈國族問題中的制度因素、全球脈絡與怨恨心態〉，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73-91，台北：群學。
- 李政亮，2009，《走進都會中國：一個臺灣人登陸十年的文化觀察》，台北縣：夏日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 李麗，2006，〈外籍人士集聚鑄就古北新地標 涉外社區聚攏商機〉，12月8日，《每日經濟新聞》，來源：房產之窗網，<http://www.ehomeday.com/NEWS/2006-12/200612890028.htm>，檢索日期：2009年4月16日。
- 李文輝，2009，〈哄抬？兩岸春節航班1位難求〉，《中國時報》，A24版，12月18日。
- 金碧，2001，《客居上海面面觀》，台北市：商訊文化。
- 林平，2008，〈身為家鄉為異客：在中國大陸的外省台灣人〉，發表於中興大學2008台商研究工作坊。
- 胡晴舫，2009，《旅人》，台北縣：八旗文化。
- 夏鑄九、黃麗玲等譯，2002，《認同的力量》，臺北：唐山。譯自 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7.
- 耿曙，2008，〈中國大陸台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站在新移民研究的起點？〉，發表於2008年中興大學「台商研究工作坊」。
- 張君玖譯，2001，《全球化——對人類深遠的影響》，台北市：群學。譯自 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UK: Polity Press. 1998.
- 陳彬，2001，《立足上海》，台北市：時報。

- 陳一雄，2004，「變造護照 供大陸人美加跳機」，《聯合報》，A8 版，12 月 22 日。
- 陳岐、耿喜梅、肖咏梅譯，2008，《政治社會學——批判性的介紹》，北京：華夏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經銷。譯自 Keith Faulks. *Polit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曾熾芬，1997，〈居留權的商品：台灣的商業移民市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7 期，頁 37-67。
- 曾熾芬、吳介民，2008，〈新公民群體的浮現？遷移中國之台灣人成員身份的跨國化〉，發表於中興大學台商研究工作坊。
- 鄒應瑗譯，2003，《創意新貴：啟動新新經濟的菁英勢力》，臺北：寶鼎。譯自 Richard L.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楊振富、潘勛譯，2005，《世界是平的》，台北：雅言文化。譯自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5.
- 齊思賢譯，2002，《中國熱》，台北市：時報。譯自 Joe Studwell. *The China Dream –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eates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 劉欣、朱曉東譯，2002，《跨國資本家階層》，南京：江蘇人民。譯自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Blackwell: Oxford. 2001.
- 劉玉照、王平、應可為，2008，〈大陸台企中的組織「斷裂」與「臺灣人」群體的社會融合〉，發表於中興大學 2008 台商研究工作坊。
- 閻紀宇譯，2008，《超級菁英》，臺北：時報文化。譯自 David J. Rothkopf. *Superclass: the Global Power Elite and the World They are Making*.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8.
- 鄧建邦，2009，〈跨國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收錄於王宏仁、郭佩宜主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頁 133-160。
- 盧倩儀，2006，〈政治學與移民理論〉，《台灣政治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頁 209-260。
- 賴佳楓譯，2008，《移民：流離的年代》，台北：五南。譯自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rd. ed.) 1993.
- 蕭新煌、龔宜君，2002，〈台商的歷史、性格與未來發展〉，載《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頁 11-32。
- 龔宜君，2008，〈台商：生成於亞洲的新興跨國資本〉，載《跨戒：流動與堅持

的臺灣社會》,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 台北: 群學, 頁 129-148。

英文文獻

- Basch, Linda & Nina Glick Schiller & Cristina Szanton Blanc (1994) *Nations Unbound :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 Bauböck, R. (1991)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New Community*, Vol. 18, No. 1, pp. 27-48.
- Brubaker, W. R. (1989) "Membership without Citizenship: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of Noncitizens." In R. Brubaker, eds., *Immig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p. 145-162.
- Brubaker, W. 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Cohen, R.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Granovetter, M.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In A. Portes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pp. 128-165.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upta, A. K. (2004) *Global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Hoboken, NJ: John Wiley.
- Hammer, T. (1989) "State, Nation, and Dual Citizenship." In R. Brubaker (eds.), *Immig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pp. 81-96.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Heisler, B. S. (2000)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In C. B. Brettell and J.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pp. 77-96.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Itzigsohn, J. (2000) "Immigra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 The Institutions of Immigrants' Political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4, No. 4, pp. 1126-1154.
- Faulks, K. (2000) *Citizenship*,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hagram, S. & P. Levitt, eds. (2008) *The Transnational Studies Reader: Intersections and Innovation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Koopmans, R. (2005) *Contested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rogh, G. von, eds. (2005) *Putting Knowledge Network into Action: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Berlin & New York: Springer.
- Lenski, G. E. (1984) *Power & Privilege*.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a, A. H. S. (2000) "Rethinking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Contemporary Migration Theories,"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第三十期》, pp. 145-188.
- Marshall, T. H.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 H. Marshall and T. Bottomore,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pp. 1-51.
- Meyers, E. (2000)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4, No. 4, pp. 1245-1282.
- Meyers, E. (2002) "The Causes of Convergence in Western Immigration Contr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8, pp. 123-141.
- Meyers, E. (2004)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 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oses, J. W.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lobalization's Last Frontier*. New York: Zed Books/Palgrave-Macmillan.
- Ong, A. & Donald Nonini, eds. (1997)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pastergiadis, N. (2000) *The Turbulence of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Hybrid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Malden, MA: Blackwell.
- Portes, A. & J. Böröcz (1989)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No. 3, pp. 606-630.
- Portes, A. (1995)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 Portes,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pp. 1-4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assen, S. (1995) "Immigration and Local Labor Markets." In A. Portes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pp. 87-12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xenian, A. (1999)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ion of California.
- Saxenian, A. (2006)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ck, P. H. (1998) "Plural Citizenships." In N. M. J. Pickus (eds.),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149-191.
- Scott, A. J., eds.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lair, L. (2002)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3rd. ed).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radley, James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talker, P. (1994) *The Work of Strangers: 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 Stalker, P. (2000) *Workers Without Frontiers: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einner.
- Stewart, T. A. (2001) *The Wealth of Knowledg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rganization*. New York: Currency.
- Sullivan, Patrick H. (2000) *Value-Driven Intellectual Capital: How to Convert Intangible Corporate Assets into Market Value*. New York: Wiley.
- Tan, S., eds. (2005) *Challenging Citizenship: Group Membe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a Global Age*. Aldershot, Hampshire, UK & Burlington, VT: Ashgate.
- Taylor, 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s.), *Multiculturalism*. Princeton, pp. 25-7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E. (1999)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 R. Appleyard (ed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p. 63-88.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 Taylor, P. J. (1993)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 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3rd. ed.). Harlow, Essex, U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 New York: John Wiley.
- Taylor, P. J. (2004)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as, B. (1973)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1978) "Migr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In W. H. McNeill and R. S. Adam. Bloomington (eds.),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seng, Y. F. (2000) "The Mobility of Entrepreneurs and Capital: Taiwanese Capital-linked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o. 2, pp.143-168.
- UNDP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Download website: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9/>

Wimmer, A. and N. G. Schiller (2003)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No. 3, pp. 576-610.



附錄一 訪談名單

代碼	性別／年齡	行業別／職位	跨國網絡	登陸時間(西元) ／置產	國籍	備註
S090719-01	男／67	服務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2／有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719-02	女／	醫療產業／經理(受雇)	兩岸	2009／無	中華民國	中階台幹
S090720-03	男／33	服務業／副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9／無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721-04	男／	製造業／副總經理(受雇)	兩岸	1979／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730-05	男／44	服務業／總經理(自營)	多國	1999／有	三重國籍 (包括中華民國)	台商
S090731-06	男／58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3／有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731-07	男／51	製造業／總經理(受雇)	兩岸	2008／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731-08	男／39	製造業／協理	兩岸	2001／有	中華民國	中階台幹
S090731-09	男／46	製造業／副總經理	兩岸	2005／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1-10	男／31	服務業／自營	多國	2004／有	雙重國籍 (包括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2-11	男／	製造業／協理	兩岸	1994／有	中華民國	中階台幹
S090802-12	男／23	醫療產業／實習醫生	兩岸	2001／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S090803-13	女／51	製造業／自營(財管)	兩岸	1999／有	中華民國	台商配偶
S090803-14	男／51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9／有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3-15	男／69	製造業／經理	多國	1989／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3-16	男／48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2001／無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3-17	男／50	製造業／專業經理人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4-18	男／	製造業／自營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4-19	男／55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88／無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4-20	女／40	電子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8／無	中華民國	女台商
S090804-21	女／47	傳產／總經理(受雇)	兩岸	2001／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4-22	女／46	製造業／自營	兩岸	2003／無	中華民國	台商配偶
S090804-23	女／47	製造業／財務長	多國	1999／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4-24	男／69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2001／有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4-25	男／47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1992／有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5-26	女／38	製造業／副理	兩岸	2008／無	中華民國	中階台幹
S090805-27	男／37	製造業／經理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5-28	女／55	製造業／自營(財管)	多國	2000／無	中華民國	台商配偶

S090806-29	男/50	製造業/經理	多國	1999/無	中華民國	高階台幹
S090806-30	女/43	製造業/自營(財管)	兩岸	2000/無	中華民國	台商配偶
S090806-31	男/42	製造業/總經理(自營)	兩岸	2000/無	中華民國	台商
S090806-32	女/43	電子業/待業中	兩岸	1997/無	中華民國	待業台人
S090813-33	男/27	傳統產業/協理	兩岸	2001/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台生→台幹
S090814-34	女/24	無業/台生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S090814-35	女/25	設計產業/專業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S090814-36	男/30	金融業/受雇	兩岸	2004/無	中華民國	台生→台幹
S090815-37	男/19	無業/台生	多國	2000/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S090819-38	女/22	無業/台生	兩岸	1999/無	中華民國	台商子女
S090823-39	男/	自由業/專業	兩岸	2002/無	中華民國	台生→專業



附錄二 跨國社群成員訪談提綱

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學歷： 國別(未歸化或歸化前)：
籍貫(台港商請填)： 到上海／台北的時間：

* 國家中心

移民動機：選擇上海／台北工作、居住的原因為何？是如何得知來上海／台北的工作訊息？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如何？

公民權利的看法：對於現在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有什麼看法嗎？取得的時限多久？遇到的麻煩或困擾？

* 跨國社群

企求移民權利：希望能改善哪些待遇？會希望取得參政的權利嗎？

組織動員力量：會參加外僑社群或外僑協會的定期聚會的嗎？如果遇到生活上的麻煩，或者政策的不便，以何方式反應？

官員政策回應：反映後有改善嗎？改善效率如何？認為官員如何選擇回應哪些要求？

* 本土社會

融入當地程度：所居住的社區為何？是否常參加當地舉辦的活動？覺得自己的觀念與想法，是否已經與當地的人相差不多？

民族情緒：覺得當地社會是否對外國人有歧視？覺得當地社會是否對外國人有特別的待遇？